

摘 要

本文试图以山西天主教的发展为序，揭示山西民教冲突的深刻原因。

民教冲突历来伴随着天主教发展的每一过程。山西天主教在明朝时曾发展为中国天主教活动的中心之一，清末因礼仪之争一度陷入低谷。鸦片战争后，山西天主教迅速发展起来，教徒人数以及教会规模都得以扩展，然而这种发展是建立在外国武力胁迫的基础上，天主教享有若干与山西民情相悖的特权，这无疑会触及和损害到山西地方士绅、老百姓的感情和利益，从而使民教冲突激化起来。

二十世纪初，义和团运动轰然兴起于山东，转而京津地区成为主要活动区域，而地处内陆的山西却以冲突之激烈闻名于世人，以致当时中外人士皆惊呼“晋案为最大”。遗憾的是，如此凸显的历史现象并未引起国内外学术界足够的重视，以往的研究或将此归结为巡抚毓贤的滥杀，或从民族斗争的角度泛而论之。本文将利用历史文献，尤其是地方文献，从毓贤、教会、地方士绅、地方民俗等方面对义和团民教冲突进行全方位论述，试图揭示其中错综复杂的原因。不妥之处，尚祈指正。

关键词：山西天主教 民教冲突

Abstract

This dissertation intends to disclose the profound cause of the conflict between Shanxi folk religions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hanxi Catholicism as the preface.

Every process of Catholicism is concomitant with folk religion conflict and Shanxi Catholicism has ever developed into one center of China's Catholicism activity in Ming Dynasty and relapsed into valley because of the dispute of etiquette at the end of Qing. After the Opium War, Shanxi Catholicism developed rapidly under the protection of foreign force and the number of saints and scale of mission are expanded, but such development is based on the intimidate of foreign force and Catholicism enjoys some privileges in contrast with Shanxi public feeling, which will doubtlessly influence the feeling and profit of the local gentries and civilian and intensify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folk religions.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20th century, Boxer Uprising springs on Shandong vigorously. Then Beijing and Tianjin became the main field of activity while Shanxi, located in inland was famous for its vehement conflict so that Chinese and foreign personages all exclaimed that the case of Jin was the maximum at that time. It's regret that so distinct history phenomenon hasn't evoked enough concern from inside and outside academic circle. The study before summed it up to arbitrary massacre of Yuxian, the provincial governor, or generally expounded it from the angel of national struggle. This paper will demonstrate in omnirange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folk religion of Boxer Uprising in the aspects of Yuxian, mission, local gentries, local focal custom and so on. Look forward to your correction wherever there are any improper.

Key words: Shanxi Catholicism Conflict between the folk religion

原创性声明

本人声明：所呈交的论文是本人在导师指导下进行的研究工作。除了文中特别加以标注和致谢的地方外，论文中不包含其他人已发表或撰写过的研究成果。参与同一工作的其他同志对本研究所做的任何贡献均已在论文中作了明确的说明并表示了谢意。

签 名：王美荣 日期：2005年6月6日

本论文使用授权说明

本人完全了解上海大学有关保留、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即：学校有权保留论文及送交论文复印件，允许论文被查阅和借阅；学校可以公布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

（保密的论文在解密后应遵守此规定）

签 名：王美荣 导师签名：顾己民 日期：2005年6月6日

第一章 导 论

一、中外学者关于山西天主教会及民教冲突的研究

山西天主教会及民教冲突尤其是义和团一段以其激烈、复杂得到了史学界的关注。近年来有一些中外学者对这一问题作过研究，下面分别这些成果简要介绍一下：

一、一些历史学家关于山西天主教会方面的著作：台湾著名史学家黄一农所著的《明末韩霖(铎书)关名前序小考》(澳门《文化杂志》2000年春、夏季)、《天主教徒韩霖投降李自成考辨》(《大陆杂志》第九十三卷第三期)、《明清天主教在山西绛州的发展及其反弹》(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6期)，主要记述明朝时绛州天主教发展的情况和当地信教士绅韩霖韩氏家族的事迹；《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中华书局出版社，1988年版)是著名史学家方豪所著，其中记述了明清时代山西天主教发展史上的重要人物传记，如高一志、段袞、韩霖、韩云等人；《明清间在华耶稣会士列传1552—1773》(费顿之著，上海天主教光启出版社，1997年版。)是一本记述明清间活动在中国各地耶稣会士的传记；樊守义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个重要的人物，除了方豪对樊守义有所介绍外，鲁利(Paul Rule)在澳门《文化杂志》第二十一期(1994年第4季度)所写的《路易·樊守义和澳门》对樊守义的生平及其《身见录》都有详尽的叙述；而历史学家阎宗临则对樊守义所著的《身见录》作了详细的较注(载于《阎宗临史学文集》，山西古籍出版社，1998版。)，使得这部珍贵的著作得以广泛流传。阎宗临为山西人，早年留学欧洲，曾长期在意大利从事天主教历史的研究，所利用的资料包括梵蒂冈档案馆以及传信部档案馆收藏的珍贵文献，他对《身见录》的注解和艾逊爵的研究都涉及了晚明山西天主教的历史；《从迎神赛社看近代山西民教冲突》(《义和团运动一百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山东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是当代史学家行龙写的一篇关于分析山西义和团民教冲突原因的文章，该文从分析山西传统的乡土信仰—迎神赛会的起源、发展以及在村社中的地位代表的社会意义谈起，得出了山西民教冲突的原因在于天主教触动了相延数千年的民俗信仰仪式，以致民教关系日日吃紧，教案纷纷迭起，并进一步导致了义和团大规模的民教冲突行为；《教务教案档》是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吕实强、王尔敏整理的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有关各地教案的档案史料，汇编有地方官员的奏折，领事馆与总理衙门往来的文件，其中不少地方与山西教案有关；《中国官绅反教的原因》(1986年版)是吕实强所写的探讨近代士绅阶级反教原因的专著，吕实强是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所长，本书是

作者整理《教务教案档》以后的作品，全部史料取自档案文库，集中论述了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教案爆发的原因，其中一部分案例与山西有关。他指出，二十世纪初蔓延中国的民教冲突主要是在中国官绅阶级的领导下开展的，天主教在外国武力的保护下进入中国，严重威胁了中国官绅的利益及地位，激起了官绅阶级对天主教的仇视，进而领导了一次次的反教运动。此书主要是从官绅阶级方面剖析民教冲突的原因的。

二、山西天主教会发展过程的第一手原始资料：《义和团运动在山西》（山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是历史学家乔志强编辑的一部山西义和团史料集，包括义和团揭帖，《晋祠志》，《退想斋日记》，《潜园琐记》，义和团清政府官方文件、地方文件，地方志中有关资料，并在最后附了有关义和团的人物传记资料，是义和团原始资料的集大成者；《帝国主义扼杀山西义和团的罪证》（山西文史资料》第3辑）是山西天主教爱国会张茂先翻译的办理教案时山西天主教教区宗座总理安怀珍和另一传教士刘博第的通信，从中可以看出天主教在处理教案时所持的复仇主义态度；《山西省庚子年教难前后纪事》是中国史学会所编的山西义和团民教冲突史料集，收集了义和团事件中地方官员奏折和清廷旨意等原始资料。

三、教会方面的著作：《山西天主教综述》是太原市天主教爱国会的名誉主任宋建勋根据P·Joannes Ricci O·F·M所写的拉丁文著作《Hierarchia Franciscana in Sinis》和《Vicariatus Taiyuanfu seu Brevis Historia》翻译而成，又经李建华等人整理编辑的一本书，尚未出版，该书从天主教传入山西一直记述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囊括了天主教各个时期的主教和教区情况，并详细记述了天主教发展史上的一些大事，史料极其珍贵；清代李问渔的《拳祸记》（上海土山湾印书馆，1923年版）记述“庚子事变”甚详，对山西境内的教案多有叙述；《忠烈英魂》（韩承良著，香港天主教方济各会出版，2000年版）和《中华殉道圣人传》（天主教台湾地区教团、宣圣委员会编印，2000年版）记述了义和团运动中的被杀的传教士，包括山西在“西辕门灭洋事件”中被杀之人；《义和团事件中太原致命者特多的背景原因》（《义和团运动与中国基督宗教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湾辅仁大学出版，2004年版）是香港林瑞琪所写的一篇文章，旨在探索义和团运动中太原出现大量“致命者”的原因；以上数种均为教会人士所撰写，带有一定的“护教”情绪，立场时有偏颇，而且忽略了事件的前因后果，本文在使用这些史料时，力图做到只运用其论述史实的部分，而去除带有偏见的因素。

二、对本文写作的一些思考和创新

对于近代山西天主教会及民教冲突的问题，中外学者们从各个角度入手，试图整理这一问题的内在因果关系。他们或以民教冲突个案为分析文本，用个别来体现一般规律；或以特定人物的政治命运为分析文本，用个人带动一段政治史的

研究；或以文化风俗研究作为突破点，来分析民教冲突的内在原因；……学者们多方面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其中不乏真知灼见。但却鲜有学者将山西近代民教冲突整体联系起来，全方位进行分析。因此笔者在查寻翻阅大量历史资料、总结继承前辈们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系统地整理山西的民教冲突问题，并尝试进行完整全面的分析，试图从中外文化差异、中外利益冲突、毓贤及地方官绅、教会自身等多方面原因揭示出山西民教冲突是在一个复杂的社会背景之下，由多种原因作用导致的，既具有普遍性，又具有自身的特殊性。

本文的章节安排和论述内容如下：

第一章《导论》，对近代山西天主教会发展及民教冲突的学术回顾，在总结学术成果的同时分析存在的值得继续探讨的问题。

第二章《山西教务的发展》，对天主教如何传入山西及在明清期间的发展作简单概述，着重介绍了近代山西教务的发展以及历任主教的基本情况。

第三章《近代山西早期民教冲突》，近代山西教务得到蓬勃发展是在外国武力的庇护下实现的，不平等条约赋予了天主教会种种特权，从而加深了民教之间的冲突，导致了山西教案屡屡发生。本章在综合近代山西早期教案的基础上，分析了教案发生的原因，包括两点，首先天主教作为政治势力取得种种特权，进一步激化了民教冲突。其次中西文化风俗的差异是造成民教冲突的另一重要原因。

第四章《义和团时期的山西民教冲突》，本章在介绍义和团在山西各地活动的经过的基础上，着重介绍了造成这次大规模民教冲突的两个重要原因：巡抚毓贤的仇教原因和地方士绅的反教态度。笔者认为：毓贤仇教出于三个原因，1、文化信仰的不同。2、窥视西太后及清廷中央政策所致。3、语言文化差异造成的误解。而地方士绅反教则因为天主教的种种特权严重触犯了地方士绅在当地的利益和权威，即使有个别官吏采取保护教会的措施，也仅仅出于免祸或者安民，并非真的欣赏教会。

第五章《义和团时期的山西教会》，主要分析在这次大规模的民教冲突中死伤惨重基于教会方面的原因。笔者认为，教会自身在这次事件中担负有重要的原因。首先，教会对形势估计不准确，甚至抱有幻想，以致死伤人数扩大。其次教会的一些重要领导人物一心求“致命”，放弃抵抗。再次，当时山西教徒的“致命”心理。笔者在这一点上从山西本地的乡土意识方面分析了造成教徒“致命”心理的原因。

第六章《善后：帝国主义列强与教会的复仇主义》，主要记述义和团事件后天主教在外国武力的支持下采取了复仇主义态度，对山西从经济、文化、政治三个方面进行了制裁，这对山西地方后来的政治经济文化造成了严重的影响。

第七章《结语》，对本文的理论进行了总结。

第二章 山西教务的发展

一、明清时代的山西天主教会

天主教传入中国是在唐朝时候，唐贞观九年（公元635年），基督教的一支聂斯脱里派传入中国，时称景教，前后流行了大约二百多年，到唐武宗时因灭佛受到牵连，后自行湮灭。¹

元朝实行宗教开放政策，天主教方济各会士经丝绸之路进入中国，首先来华的人是意大利人柏朗嘉宾，也称若望嘉宾（Joannes de Carpino）。其后是意大利人孟高维诺（Ioannes de Monte Corvino）和德国人亚尔诺·古路（Anoldus von Kolu），他们在北京共同创立了教区，这是中国天主教史上的第一个教区。天主教在元代有相当的发展，但由于方济各会士传教的对象仅局限于占统治地位的蒙古贵族和上层阶级，未能扎根于群众之中，因而在元代覆灭之后，天主教也随之消亡了。

明朝时期，耶稣会士利玛窦（P Mich Ruggieri）、郭居静（P Las Cattaneo）、龙华民（P Nic Longobardi）等人先后来华传教，他们以适应中国风俗习惯和传播西洋科学知识（天文、算学）等方法作为手段，结识了当时的礼部尚书徐光启、太仆寺少卿李之藻等好多上层人士，徐、李等人先后领洗入教，在他们的影响下天主教在中国逐步发展起来，至明末教徒已近4万人。清康熙时期允许百姓信仰天主教，到1700年，教徒人数剧增到了30万。²此后，虽然天主教的发展仍经历了好多挫折，但再也没有间断过。

天主教传入山西据传闻中所说是唐武周时期。唐代的太原和宋代以后的太原是不同的，太原作为唐高祖李渊的家乡和起兵之处，在唐朝的意义是非同一般的，在当时，它是一个很大的城市，曾做过北都。它的幅员辽阔，地连三城，横跨汾河两岸，所占的位置很重要，是北方重镇，也是北方的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中心。景教进入中国后，蔓延200余年，足迹可以说踏遍神州，所造寺院，遍地林立，大秦景教碑文说：“寺满百城。”这是当时的实际情况。晋陕两省，一衣带水，隔河相望，所以景教传入太原的时间比较早并不奇怪。20世纪二三十年代，加拿大圣公会传教士明义士（1885—1957）在河南、山西进行考古调查，发现了4块碑石，他说从山西大同至内蒙古包头一带已发现了一千多个十字架，这说明

¹关于景教之名，后世的教会人士有所解释，明末天主教人士李之藻曰：“景者，大也，照也，光明也。”明末来华的耶稣会士阳玛诺也说：“景者，光明广大之义；教者，教会也，言信仰景道之人缔结之团体。”景教碑文上有一句：“真常之道，妙而难名，功用昭彰，强称景教。”——朱谦之《中国景教》东方出版社1993年，第15页。

²《山西通史》，刘泽民等主编，山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四章，第366页。

元代山西北部景教有很大的势力。¹《元史》上说：“敕西京僧、道、蛮、也里可温（基督教），达失蛮等有家室者，与民一体输赋。”²西京就是指大同。山西景教史上还有一位著名的人物，就是马克斯，他生于山西霍山县，曾被任命为“东方教会总主教”，法号雅八拉哈三世，其辖区从东方的中国至西方的巴勒斯坦，北至西伯利亚，南至锡兰。³

天主教真正传入山西，始于公元1620年（明万历四十八年）。第一个进入山西的传教士是意大利籍耶稣会士艾儒略（Iulius Aleni），艾儒略生于意大利的Brescia城，1613年进入中国内地，1621年应山西绛州韩云的邀请来到山西，⁴韩云在艾儒略来之前已经对他的许多朋友和亲戚做了天主教基本原则方面的辅导，艾儒略到绛州之后，对这些人做了全面的指导，给十八个人进行了洗礼，后因反对天主教公告的发布艾儒略离开绛州返回了扬州。⁵

1624年，比利时籍耶稣会士金尼阁（Nicolaus Prigault）来到山西，在绛州定居，并建了一个小教堂，这是山西有天主教堂的开端，金尼阁也因此被誉为山西天主教的首任本堂神父。金尼阁在绛州劝化了两位宗室官员信奉天主教，一名是一个庞大家族的族长，有族众千余人，另一名为城中首名大员；因为二人的奉教，其他享有名望者数人也随着皈依。金尼阁后来应王徵的邀请去了陕西，接替他的是意大利耶稣会士高一志。

山西天主教的真正发展始于高一志（P Alph Vagnoni），高一志原名王丰肃，1605年来到南京传教，他“是在中国传教团中仅次于利玛窦的、在天主教徒中受到广泛爱戴和尊敬的人”。⁶1624年，高一志到达山西绛州传教，在一批学者的支持下，高一志将山西经营成了中国天主教的一个主要活动中心。虔诚的天主教徒韩云、韩霖给了高一志极大的帮助，⁷他们建议高一志走访绛州，并给他建造了一座教堂和一处住所。在两兄弟的帮助之下，高一志很快就为二百多位成人付洗，其中有学者六十人，宗室成员多人。1626年，受洗者达到五百，次年又加五百，以后逐年都有增加。绛州当地的另一富绅段袞也是高的得力助手。⁸浦

¹《齐大季刊》3卷5期，1934年12月。

²《元史》，明代宋濂等编著，卷九，至元十三年六月。

³ 顾卫民：《中国与罗马教廷的关系史略》，东方出版社，2000年版，第11页。

⁴韩云，字景伯，康熙《绛州志》中有其小传：万历壬子科中第七名。仕徐州知州，改汉中府推官，再起葭州知州。藏书数万卷、法帖数千卷。与徐玄扈相国、董思白宗伯诸先生称文字交，与西士讲音韵之学，辑《耳目资》。星、历、兵、农，无不究心。诗工七言律，字摹蕙、王。所著有《武德内外编》、《劳人草农书》。其自赞像云：“交游海内海外，家住江北江南，学参天上天下，品不入后人前”。性虽好奇特，亦娇俗不群者。于州城议筑统台，作统数千（十）门置台上。六年之变，车雷震撼，守圉增壮，实仗赖焉。

⁵邓恩：《从利玛窦到汤若望》（1552—1773），第13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

⁶邓恩：《从利玛窦到汤若望》第110页。

⁷韩霖，字雨公，绛州人，天启元年（1621年）举人。善诗文，工书法，家藏书数万卷，在北京信奉天主教，洗名多默。韩霖在家乡有较高的威望。高一志在绛州开教，得韩霖的帮助很多。其家人在他的影响下，都受洗入教。著有《铎》书，引述教理与教会书籍颇多。又与张骞合著《圣教信证》，是我国第一部记述天主教传教士传略与著作的书——康熙《绛州志》，北京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抄本，原刊于康熙九年，卷一，页59。

⁸段袞，字九章，绛州巨绅。在北京信奉天主教，洗名斯德望。归家后，劝家人劝教都奉教。高一志在绛州

州的韩炉曾经任北京的内阁大学士，¹ 也对高一志给予极大的帮助，他邀请高一志造访蒲州，并在该城的学者中间为他宣传，高一志在蒲州度过了四个月，当他离开的时候，他已经为这里建成一个天主教的中心打下了基础。1634年，山西发生了大饥荒，高一志购置了一所住宅，专收弃儿，并派方德望(Stephanus le ferre)和来自澳门的助理修士陆有基(Fr Emmanuel Comez)负责管理，弃儿人数不久就达到了300人，这是中国传教史上的第一座孤儿院。² 1634年，傅汎济(P FranÇ Furtado)在视察了中国全部十二个耶稣会定居点后，给总会长写了一份报告。在报告中，他表示出对高一志的赞颂，“我发现全部二十三位欧洲神父和四名出生于澳门的中国修士，在转变异教徒灵魂和他们自身的修养上都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但是在这当中，我从山西的王丰肃和北京的龙华民身上则感到了最大的欣慰，他们两人年事已高，都超过古稀之年，但是仍在天主的葡萄园里辛勤的劳作，就像他们只有30岁一样。”³ 1640年，高一志卒于绛州，埋葬于绛州城西的段家庄，即段袞的故乡，俗名高崖坟。⁴ 高一志在绛州一带传教，前后达15年之久，当高一志进入山西的时候，全省只有由金尼阁施洗的20来名天主教徒。在他去世的时候，山西有了102个天主教徒团体，8000多名天主教徒。其中200多人是考取了功名的，有些还是重要的官员。为此，高被誉为“山西宗徒”。高一志一生著作颇多，主要作品有《西学修身》、《西学齐家》、《西学治平》、《童幼教育》、《空际格致》、《神鬼正纪》、《十慰》、《圣母行实》、《教要解略》、《达道纪言》等。

与高一志大体同时在山西传教的还有：⁵

罗雅各(Jacobus Rho)，意大利人，天启四年(1624年)跟随高一志到达山西，协助高一志开发山西教务，并学习中国语言。罗雅各在山西工作了五年，后被调去北京。

石宏基(Franciscus de lagea)，澳门人，助理修士，崇祯三年(1630年)至五年协助高一志传教。崇祯六年调往江西。

方德望(Stephanus le ferre)，法国人，崇祯二年(1629年)来华，崇祯七年(1634年)被派往山西绛州协助高一志，两年后被调往陕西。

开教，段袞协助很出力。段袞在家乡很有威望，教内外人士都很敬重他。曾自己出资，修建绛州教堂。一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中册，中华书局1988年版，页273页。

¹韩炉，字象云，蒲州人，官至相位。在北京与徐光启、汤若望熟识，闻道而奉教，且很虔诚。致仕归里后，邀高一志到蒲州开教。为时不久，教务大兴。其家人也多奉教。《明史》(明代宋濂等编著)有其传，节录一段于下：“万历二十年进士，四十五年擢礼部右侍郎。泰昌元年拜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参机务。天启元年加少保，吏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加少傅、太子太傅、建极殿大学士。三年加少师、太子太师。廉直自持，不容于魏忠贤，五年七月被劾削职。乃极止先墓。崇祯元年十二月复为首辅，引疾退”。年八十而终。

²(法)费顿之著，梅乘骥译，《明清间在华耶稣会士列传》(1552-1773)第103页，上海天主教光启出版社，1997年版。

³Daniello Bartoli之书(Daniello Bartoli, Dell' historia della Compagnia di Giesv la Cina terza parte dell' Asia, Rome, 1663), IV, 第535-536页。

⁴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中册，中华书局出版社，1988年版，第272页。

⁵《明清间在华耶稣会士列传(1552-1773)》，费顿之著，梅乘骥译，天主教上海教区光启社，1997年11月。

陆有基(Fr Emmanuel Comez), 澳门人, 助理修士, 崇祯六年(1633)来绛州, 负责办理育婴院。

郭纳爵(Ignatius Tudeschini), 葡萄牙人, 崇祯十年(1637年)来晋南, 两年后去陕西。

杜奥斯定(Augustinus Tudeschini), 意大利人, 崇祯十二年(1639年)来山西, 不久即去陕西。

万密克(Michel walta), 德国人, 崇祯十一年(1638年)被高一志派到浦州传教, 因原来的老堂太小无法容纳所有的教徒, 他在浦州府兴建了一座新堂, 后李自成的军队攻占浦州城, 万密克抗击农民军, 死于浦州。¹

法国传教士金弥格(Michael Trigault)在山西的天主教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万密克死后, 由金弥格管理山西全省教务。金弥格在三十五年的传教生涯内, 亲手创办了二十二所堂口。1637或1638年度, 据金弥格统计, 在他的辖区内有560人受洗; 1652年有407人受洗。金尼阁在太原城内修建了小教堂, 逐渐使天主教在太原扎下了根, 因此被誉为太原的第一任本堂神父。² 1667年9月30日, 金弥格在广州去世, 葬于广州城外的“河之南”。

1696年(清康熙三十五年), 罗马教廷在中国建立了北京、南京两大教区, 同时另批了9个代牧区, 山西、陕西两省各占其一。山西归耶稣会士管理, 陕西归方济各会士管理。当时负责山西教务的是意大利耶稣会士艾逊爵(P Jos-Ant Provana)。艾逊爵, 1695年来华, 1699年至1701年间负责河南、陕西和山西三省的教务, 他在山西期间, 把太原府金弥格建造的教堂重新整修, 教徒人数有了显著增加。当时在山西省内下面几个府县都有堂口: 太原、靖乐、平遥、吉州、洪洞、襄陵、太平、浦州、潞安府、岚县、汾州和襄垣。1702年艾逊爵调往北京, 后为“礼仪之争”, 被康熙皇帝派往欧洲, 1720年在返回中国的路途中因病去世。³

艾逊爵之后, 意大利耶稣会士张安当(Mgr Ant Posateri)被委任为山西的代牧主教, 当时山西省教徒人数约在3000人左右, 分属太原、绛州两堂口。张安当于1705年死后, 山西再未设立主教, 空悬达十一年之久。从1716年始至1844年止, 山西、陕西两省教区合并为一, 称为山陕教区, 归方济各会士管理。其间, 经过128年, 正副主教更替共16位, 见下表:⁴

姓名	任期	终地	备注
安多尼拉基 Ane Laghi)	1716—1729	终于西安	
方济各桑拉才尼(Fran Saraceni)	1731—1741	终于陕西	
方济各费来理(Fran Ferreri)	1792—1798	终于绛州	副主教

¹ 《山西通史》第367页。

² 邓恩:《明清间在华耶稣会士列传》(1552—1773)第240—241页。

³ 《明清间在华耶稣会士列传》(1552—1773), 第562页。

⁴ 郭崇禧:《太原天主教史略》, 载于《太原文史资料》第152页, 太原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辑出版。

欧日搦皮劳第 (Eugen Piloti)	1739—1755	终于绛州	
若望安多尼包甘尔 (Oncher)	1753—1765	终于澳门	充军
若翰穆利第 (Maalitti)	? —1762	终于陕西	未祝圣
方济各马尼 (Fran Magni)	1765—1785	终于北京	
纳大纳尔 (Burger)	1778—1780	终于太原	
安多尼沙高尼 (Ant Scaconi)	1778—1785	终于北京	
克米胜爵 (Cavalli)	1790—1791	终于北京	未祝圣
若翰 (De Mandello)	1793—1804	终于绛州	
安多尼类思 (Landi)	1804—1816	终于洞儿沟	
若雅敬 (S Falvetti)	1815—1843	终于祁县	
若望 (De Pompeiana)	1823—1828	终于汉中	副主教
亚尔丰肃 (De Donato)	1843—1844	终于西安	

由于受礼仪之争的影响,山陕教区 128 年间,有 124 年是在清政府禁教时期。当时天主教处于极不自由的阶段,教堂被封,教产被没收,教士被驱逐,一切宗教活动都转入了地下,雍正年间更加深了对天主教的“禁令”,各处的传教士均被遣送出境,不允许传教,而教堂则改为书院、义学或祠堂,山西天主教的发展进入低谷时期。

在山西的天主教发展史上,平阳人樊守义在中西文化交流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方豪在他的《中国天主教史人物列传》里记载:“樊守义,又作守利、守和,山西平阳人。康熙二十一年(1628年)六月十三日生。”¹ 这里没有具体说明白樊守义究竟生于何处,现在的大多数资料都认为樊守义生于平阳,但根据其墓碑记载:樊守义是于 1682 年生于山西绛州。² 樊守义年轻时就成为艾逊爵的助手。1708 年随艾逊爵出使欧洲,曾先后在意大利都灵、罗马求学,1720 年在里斯本和艾逊爵乘船返国。艾逊爵在乘船途中患病去世,樊守义为他送终,并将他的尸体带回广州安葬。³ 随后樊守义进京向康熙禀报出使详情,并将其亲身经历写成《身见录》进呈。《身见录》全文 5400 多字,简单地记述了樊守义出游的见闻,反映了当时欧洲的一些风俗民情,这是国人写的最早的一部欧洲游记,不仅是当时中国和意大利等欧洲国家友好关系的见证,而且在我国旅游文化领域也享有一定地位。樊守义后来在北京附近传教,足迹遍及东北和山东。1753 年 2 月 28 日樊守义在北京去世。⁴

二 山西近代教务的发展

鸦片战争,尤其是 1844 年《黄埔条约》“弛禁”天主教以后,为应当时传教

¹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中册,第 33 页,中华书局 1988 年版

²鲁利:《路易·樊守义和澳门》,澳门《文化杂志》第二十一期,1994 年第 4 季度,第 231 页。

³《明清间在华耶稣会士列传》(1552—1773),第 802 页。

⁴阎宗临:《〈身见录〉校注》,《阎宗临史学文集》,山西古籍出版社,1998 年 9 月出版。

方面的新形势，罗马教廷传信部将原来的秦晋代牧区划分为山西、陕西两个代牧区，从此山西的教务正式与陕西分开，教廷同时委任杜约理（Gabriel Grioglio 1813—1891年）为山西的首任代牧主教，领 Euricensis 主教衔。

杜约理为意大利人，1813年10月7日生于塔吾里教区塔小城，17岁时参加方济各会，晋铎后不久，即于1840年来华，他与同伴江类思(Aloysius Moccagatta)先去了山东，次年转来山西，一直在山区中传教。当他接到委任时，由于禁教的风波尚未平息，他感到害怕，欲向罗马辞职，后经原秦晋教区最后一任代牧冯尚任(Alrhonsus Donato)的劝说，才于1845年6月13日于文水新立村接受了冯尚任的祝圣。¹ 当时山西全省有信徒七八千之众，四名外国传教士，十六位中国籍神父，其中一部分从拿坡里圣那学院毕业回国的，一部分是在本地的修院里祝圣的。²

杜约理时期（1844—1862年）的外国传教士和中国神父见以下两表：

姓名	来晋期	终期	终地	备注
赵禄茂 (Bartholomaeus Sandrini)	1844年	1861·8	潞安马厂	曾任副主教、修院长
梁多明 (Dominicus Sgarriglia)	1846年	1862·9		后从山西转往山东
方行瑞 (Valentinus Jcardi)	1864年	1888·6	洞儿沟	
张武良 (Paulus Carnevali)	1858年	1875·11		1872年任助理主教
武嵩秦 (Joachim Orsi)	1859年	1887·4		1861年转山东
傅安当 (Antonius Feliciani)	1859年	1886·3	洞儿沟	
董德超 (Jsaysa Spravalero)		1871·11		

姓名	籍贯	祝圣日期	终期	终地
陈良	潞城安阳人	1830年	1879年9月21日	
王智	文水新立村人	1838年	1880年3月30日	
郭约安	阳曲县人	1833年	1884年1月14日	
王若望	太原三贤村人	1846年	1886年3月7日	圪窰沟
安安德	平遥城人	1848年	1877年5月11日	
李乾元	忻州畦子沟人	1848年	1879年7月9日	
高若望	平遥杜村人	1849年	1889年5月4日	
张方济		1850年	1853年9月13日	
徐保禄		1850年	1872年4月6日	
孟若翰	太原高家堡人	1850年	1884年12月12日	
王挺荣	文水新立村人	1850年	1891年3月12日	
高楞佐	圪窰沟人	1851年	1881年5月14日	
刘保禄		1852年	1870年8月3日	潞安

¹铅印本：《山西天主教概述》（初稿）这本书是已故太原市天主教爱国会名誉主任宋健勋根据拉丁文资料 P·Joannes Ricci O·F·M 所著的《Hierarchia Franciscana in Sinis》（Ex Typographia Franciscana Wuchang 1929 湖北武昌）和《Vicarius Taiyuanfu sea Brevis Historia》（Ex Typographia Congregationis Missionis Pekini 1929 北京）翻译，由山西太原教区副主教李建华等人整理编辑而成，卷一，第46—48页。

²同上。

刘保禄		1854年	1871年1月8日	太原
杨若望	屯留郭村人	1854年	1884年6月8日	
王玛竇	清源梁泉道人	1856年	1895年5月18日	
田安德	长治人	1856年	1901年	潞安
刘廷宝	阳曲县西黄水人	1858年	1871年1月18日	太原
张安道	阳曲土岑村人	1858年	1871年5月22日	
张保禄	黄花园人	1860年	1909年5月12日	洞儿沟
赵毓谦	阳曲县河上咀人	1860年	1900年8月9日	方山杨家坪
连神父	屯留藕泽村人			

1862年6月,杜约理离开山西返回欧洲,将教区交给副主教傅安当(Antonius Feliciani),傅安当于1804年生于意大利北部教区马拉纳,1821年入方济各会,1933年抵澳门,一年以后经湖广入山西时,在湖广得病,于1838年返回澳门,后去香港,1860年被派往山西山区传教,1866年3月在洞儿沟去世。

近代山西代牧区的第二任代牧主教为江类思,他管辖山西教务的时间是1863—1890年。

江类思原名 Aloysius Moccagatta,意大利人,1826年10月参加方济各会罗马会省,改名类思,1833年4月23日晋铎,1840年来华,1847年转任山东代牧主教。1863年被任命为宗座视察员来山西,与当地教会发生矛盾,1866年傅安当去世以后,他再次来到山西,成为山西代牧区的实际管理人。1872年罗马教廷正式任命江类思为代牧主教,他任命意大利籍的张武良(Paulus Carnevali)为助理主教。1875年5月23日,张武良在马桃园村去世。1876年,江类思又选择其外甥艾士杰(S Gregorio Grassi)为其第二任助理主教。在1877年到1879年之间,当时山西发生极为严重的旱灾,以后灾情又蔓延到华北,仅山西省就有四百万人饿死,占全省人口三分之一,江类思和艾士杰在此期间从事了一些教会慈善救济工作,但仍有4000余信徒饿死。

江类思晚年双眼失明,六年时间,除念玫瑰经外,什么都不能做。但1890年6月17日,山西天主教南、北分区时,江类思仍称山西北圪教区首任主教,直至1891年9月6日于太原去世,葬于西涧河神职公坟。

江类思在山西任职期间(1865—1890)祝圣的中国神父有:田丰兰(1866),常楞佐(1868),白若瑟(1870)、申保禄(1872)、张若瑟(1875)、杨雅敬(1876);其间由其助理主教祝圣的有:常守忠(1880),王英(1880),贾保禄(1881)、高隶修(1881),胡宝善(1881)、郑全义(1882)、杨雅各(1884)、高达陡(1884)、刘聪睿(1886)、杜甘棠(1884)16人。

其间来山西的外籍教士有:(1868)富格辣(Franc Fogolla)、雷体仁(Elias Facchini)、魏亲贤(Athan D Agostini)。(1872)梅类思,(1876)葛瑞德,(1885)德奥理(Theod Balat),武奥林(Hugot Villeret),(1888)艾定禄,法有德,翟守仁、翟守道、安守信,林国栋,(1889)潘树德,范像风,(1890)包懿德,阎懿德,

安邦济(Pacificus Mascetti), 马宗燮(Mathaeus Canioni), 共 19 人, 其中 12 人是荷兰人。江类思在山西新建、改建、扩建了不少教堂及活动场所, 北起大同, 南至永济, 于 1882 年全山西省共 15 个堂区, 300 个会口, 15000 名教徒, 圪僚沟的教堂扩建, 红沟, 河上咀的教堂初建都是江类思批准的。江类思在山西召开过两次(1880, 1885)中国天主教第二区域(包括, 山西, 陕西, 甘肃, 山东, 河南)地方会议, 决定了不少有关当时传教事业的规定。1885 年 9 月 1 日, 召开第二次会议, 在太原府主教堂由艾士杰祝圣了山东助理主教李博明(Beniaminu mgeremia)。¹

1890 年 6 月 17 日, 根据江类思及艾士杰的申请, 罗马教廷划山西代牧区为南、北两个代牧区(简称教区), 当时山西省居民共一千三百一十万人, 天主教徒有两万名之众。

北圪代牧区管辖的地方有太原、汾州、大同、宁武、朔平五府、忻州、代州、保德州、平定四个直隶州及其各自所属 39 个县, 浑源、应州、朔州、崞岚、永宁五散州, 清源、马邑、乐平三方划归北圪教区, 称“山西北圪代牧区”, 主教座堂设太原府城, 全教区居民 700 万, 信徒 13000 人。

南圪代牧区包围潞安、泽州、平阳、蒲州四府, 辽州、沁州、解州、泽州、隰州、霍州六直隶州及其所属共 46 个县, 还有吉州、平顺乡、称山西“南圪代牧区”, 主教座堂设于潞安府城, 全教区居民 600 万, 信徒 9000 人。

北、南圪教区划分时, 原山西代牧主教江类思及其助理主教艾士杰仍以原职留在北圪教区, 此外尚有 8 名外籍传教士留在北圪, 其中两人属法国籍, 其余均为意大利人。当时全省有中国籍神父 20 位, 留在北圪教区 16 位。

江类思于 1891 年 9 月 6 日去世, 助理主教艾士杰继主教位, 为山西北圪教区第二任代牧主教。

艾士杰(S·Gregorius Grassi, OFM), 1833 年 12 月 13 日生于意大利北部亚历山大教区各孟地城, 父母均为教徒。他本人是江类思的外甥。1842 年 12 月 14 日参加方济各会, 并改名为额我略。1856 年 8 月 17 日晋铎以后, 被上司委任为本会院修士的神师。1860 年来到中国, 先在山东传教五年, 1865 年转来山西。1876 年 1 月 28 日被任命为山西助理主教, 因江类思年迈多病, 同年 11 月 19 日在太原府主教座堂, 被遣使会士、直隶正定教区代牧主教戴济世(Franciscus Tagliabue)祝圣, 承担教区工作。

江类思去世后, 艾士杰继位, 至 1900 年仅有十年, 在此期间, 艾士杰新建或扩建教堂六十余座, 到处开办慕道班培训, 位新会口设立一百余处祈祷所献祭处, 1890 年南北分区时, 北圪教区有 13000 教徒。1900 年已增至 18000 人。²

艾士杰感到传教去外国的教士不够用, 1890 年南北分区时, 北圪有外籍教

¹铅印本:《山西天主教概述》(初稿), 卷一, 第 51—52 页

²《中华殉道圣人传》, 天主教台湾地区主教团、宣圣委员会编印, 2000 年 3 月版, 第 235—239 页。

士 10 人至 1900 年只留其中四人；有中国神父 17 人，至 1900 年留有其中的 13 人。另外，在教徒村洞儿沟南山建立了会院，又于 1893 年 8 月 20 日为本地青年开创初学院。1897 年艾士杰委任其副主教带着四名修士前往直意大利参加第二年（1898 年）在都灵召开的世界传教区展览会以及万国博览会。

当时北圻教区的助理主教为富格辣（S·Franciscus Fogolla, OFM），他是方济各会士，1839 年 10 月 4 日生于意大利亚布纳教区蒙代拉基城，圣名方济各。后来他在庞蒂莫利读小学，随其家族前往巴马，当时他常去教堂做辅祭，1856 年 11 月 1 日入方济各会，1863 年 9 月 13 日晋铎，三年后去罗马圣安东尼大学读书，1866 年乘船前往东方。在巴勒斯坦逗留一年，一边朝圣一边为他的传教工作做准备。1868 年（同治七年）抵山西太原府，7 年后被升为龙岗府教区总代理，曾参与赈灾，并修建了一所新的教堂。富格辣懂得中国语言文字，能与当地官员沟通。

此后，富格辣又被任命为修院的院长和教区总代理，还建立一所孤儿院和一个诊所，1898 他参加了在意大利都灵举行的国际博览会，同年 8 月 24 日，他在巴黎被选为艾士杰的助理主教。次年 3 月，他带领 9 名司铎和修士，7 名玛利亚方济各修女会的修女回到山西。¹

¹韩承良：《忠烈英魂—方济会中华殉道圣人小传》，香港天主教方济会出版，2000 年 10 月版，第 41 页。

第三章 近代山西早期的民教冲突

一、近代早期山西教案

山西教会势力在19世纪的最后10年发展很快,大规模的义和团运动爆发前,属于天主教的会所和大小教堂在山西、直隶、山东、河南四省有4000余处,山西一省的教徒达到3.5万人左右,这是教会在山西活动的极盛时期。¹

不平等条约赋予天主教的种种特权,加深了民教之间的冲突,山西教案屡有发生。现根据《教务教案档》的记载,将近代山西所有的民教斗争事件按时间顺序作一简单介绍:

绛州:咸丰十一年六月(1861年7月),法国传教士梁明多要求山西巡抚英桂将绛州东雍书院查还天主教,东雍书院在清初曾为天主教堂,雍正禁教之后将其改为了地方书院。梁明多的要求遭到地方士绅的拒绝,双方僵持两年之久,最终在国外势力的压迫下,绛州被迫交还东雍书院。

凤台:咸丰十一年七月(1861年8月),天井关村马海嘴因为信教,拒绝遵守村规礼仪,村社首领率领八十多号人,将马海嘴打成重伤;同月,阎庄村民李祥太等人以入教为由,拒绝缴纳献戏焚香等钱,民教双方发生冲突,在诉讼中,双方言词不一,传教士声称村社首领常氏率领一百余人到教民李祥太家,把他拖入庙内,勒令交四十千文钱,用来修庙唱戏,并且把李祥太所种的桑柿树砍伐掉四十余棵。但山西巡抚却在禀文中指出,村社首领并没有带人勒索强迫,而是为了追回他们在村社中的欠款,数目也不是很多。树木被砍也不是常氏派人干得,而是因为民教失和,树木没有人看管导致的。²

霍州:咸丰十一年(1861年),霍州知府审理教民田树银状告刘丙申一案,判令田树银和刘丙申各自敬各自的神,不允许刘丙申等村社中人向田树银讨要唱戏、迎神、祭祀等费用,所有办差看田的费用都由村中公摊公派,刘丙申等社中人要给田树银看守田禾,并赔偿田树银在这次纠纷中所受的损失。³

阳曲:咸丰十一年(1861年),窑儿上村社首领张际宗因为村中教民白耀、张纯等人拒绝遵守村规,不愿缴纳村中摊派的费用,将他们控告到县衙,教民为此将其打伤。另外涧河村社首领贾年等人控告乐保元等,长子头村程国控告陈明等,享堂村社首领王致中控告张也玉等人,均为教民不愿缴纳村中费用。⁴

壶关:同治二年正月(1863年),安口村教民申安德上诉,因为信教与村中

¹《山西通史》卷六《义和团运动在山西》,第238页。

²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编:《教务教案档》第一辑,第716页,1974年2月版。

³同上,第720页。

⁴同上,第721页。

习俗惯例发生冲突，被邻村崔氏以此要挟，并强占他的财产。¹

归化：同治九年三月（1870年），贺选拒绝分摊村中敬神演戏的三千二百文费用，与姐夫王玉发生纠纷。村中教民因为王玉不信天主教，把他打成重伤。²

孝义：同治十二年十二月（1873年），东头村郭起茂上诉，本村郭士郎等人因为他信仰天主教，拒绝缴纳村中求神等费用，就指使一些人将他成熟的田禾盗去一半，县令判决此类活动与郭起茂没有关系，让巡查田禾的人赔偿郭起茂六斗谷子。³

大同：光绪七年十二月（1881年），榆林村社首领管芳等率领村民向教民纪运昌、管祥、杨天资等人索要戏钱，双方发生冲突。⁴

天镇：光绪七年（1881年），定安营村民高应诊等与传教士王先培发生冲突，具体原因不祥。⁵

寿阳：光绪二十一年七月（1895年），教民张乾元因为摊派演戏费用与村社首领刑聋三发生冲突并诉讼到衙门。⁶

二、 早期民教冲突的原因

分析山西早期民教冲突的原因，大致有两个方面：

1. 天主教依靠政治势力取得种种特权，进一步激化了民教之间的矛盾。咸丰十一年（1861年），法国公使布尔布隆照会清朝总理衙门大臣奕訢，要求给外籍传教士政治和经济上的特权，并“请烦贵亲王备文行知山陕督抚，务须按照条约善待传教习教之人”。照会中申斥了阳曲的地方官对教徒的控诉案件，指责山西地方对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签订的条约没能做到“遍为张贴”；在山西的天主教，上有各国驻京使馆撑腰，下与清朝地方官勾结，横行民间，激起了好多人的愤懑。榆次县韩村有一教徒，入教数年后，家中“骡马成群，仓箱充牣，富甲一方”。⁷榆次车辋村公理会教徒刘风池“在太谷洋夷馆竭力劝人入教，藉势虐民，常入官府关说词讼，人皆侧目而视”；⁸同治七年（1868年），山西丰镇天主教堂指使教徒韩大成抢占村民孟士仁的土地；光绪二十年（1894年），丰镇教徒杨世望等强占农民土地，将农民刘守功逼死；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丰镇教堂又拆毁农民住房，押捕拷打农民，霸占农民宅地为教会属地；潞城县马厂地主阎贵生借教

¹同上，第757页。

²《教务教案档》第三辑，第413页，1975年2月版。

³同上，第480页。

⁴《教务教案档》第四辑，第312页，1976年5月版。

⁵同上，第313页。

⁶《教务教案档》第五辑，第658页，1977年10月版。

⁷刘大鹏：《潜园琐记·榆次义和拳篇》，载《义和团在山西地区史料》，乔志强编著，山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2—45页。

⁸同上。

堂势力害死当地民众，传教士詹守仁加以包庇，使其逍遥法外。¹下面以东雍书院为例，说明当时教会的蛮横霸道以及由此造成的民教矛盾的进一步深化。

绛州教堂原来是明朝的一所王府，清朝初年改为天主教堂。雍正二年（1724年）禁教，堂内传教士被遣往澳门，雍正三年四月，地方士绅联合奏请知府将此堂改为书院，并且仿造白鹿洞书院的结构进行改建修整，每年春秋，在书院内举行祭孔大礼，并将剩余的房屋租给民人居住，所得租金，供作贫寒学生的生活补助。乾隆五十八年（1793），绛州知府王瑀曾向地方绅士发起募捐，并拨给建塔费用四千余两，将书院大肆整修，又买了若干房地，出租以增加学生的生活补助。²

咸丰十一年（1861）六月，法国传教士梁多明拜见山西巡抚英桂，请求查还东雍书院，地方官绅自然反对，总署也不同意，并于十一月，照会法国公使哥士耆（Michel·Alexandre Kleczkowski）说：“绛州天主教业经该抚飭属另择相当地方抵给，因该处士民有所不服。既已飭令择地抵给，即可另行建造。”³但法国公使拒绝这一建议，坚持要归还东雍书院。

不久，总署再度照会法国公使，说明东雍书院已经成为青年学子的学习之地，勉强迁移恐怕会激起民愤。他强调说：

“贵国传教士现来中土，与我国士民相接，彼此聚处之日甚长，总须划去畛域之见，相孚以信，相接以和，永无嫌隙，方可日久相安，共为保护，于传教士甚为有益。倘主教及传教士必欲固执己见，偏护习教之人，恐不习教者心怀不服，将来必致激成事端，疏非两全之道。”⁴

总署的态度虽然非常诚恳，但因教士坚持，法国公使不肯让步，万不得已，于同治元年（一八六二）正月，令山西巡抚英桂按照教士要求，查还东雍书院。

英桂接到总署来文，只好尽力向地方绅士劝说，将原来的孔子神位改移别处供奉，将院中师生另外妥善安置，然后再将书院原有房屋财产清册，准备点交。而教士梁多明竟因为没有将官绅集资购买的后置房地全部交付而拒绝收领。⁵但总署认为绛州书院后置房产，应该属于地方所有，与教堂无关，所以不能移交教士，为此，总署再度照会法国公使：“其房屋等件，俱点交清楚，该教士一有收据，便可了结。……乃本爵与贵大臣俱有讲信修睦之心，而该教士无直截了当之行，若非别有贪刻之处，何以不愿完结，……将来与该州绅民不能和协，以致绅民同生轻薄之心，系由该教士自取，不能归咎中国无优待之礼也。”⁶此时，法

¹中国科学院山东分院历史研究所编：《义和团运动六十周年论文集》，中华书局1961年12月版，第168页。

²《教务档山西教务》，咸丰十一年十月一日总署收山西巡抚英桂文及附件：①东雍书院记②东雍书院评文③重修东雍书院碑记。

³同上，咸丰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总署给法国照会。

⁴同上，咸丰十一年十二月六日总署给法国照会。

⁵《教务档山西教务》，同治元年六月二十五日总署收山西巡抚英桂文。

⁶同上，同治二年七月三日总署给法国照会。

国公使可能也知道了本案的实际情况，命山西主教前往绛州收领东雍书院。¹九月二十九日，山西副主教副安当委派教士张武良到达绛州接收东雍书院。²这一案件前后拖延了两年多，总署与地方官经历了许多波折与困难，方才完结。但地方士绅的不平与愤恨，自然是难以抑制。他们在书院交出以后，就开始募捐购地，建立大成殿来容纳圣贤神位，并重新开建书院，仍旧起名东雍书院，另外还在南关建造东雍分院。后来李焕扬撰写的“两书院碑记书后”说：

呜呼！异端之显与吾道为敌，盖至今日而极矣！……咸丰之季，中西讲和，廷议悉以故地畀西人，绛州之搢绅校士争之不得，见至圣神像揜弃于不洁之地，乃购地募财……遂创今书院焉。南关好义者，亦闻风施地，具详上请。于是城关两书院巍然并峙。夫书院何者也？非所谓正人心而明圣道乎……彼不经之教何如乎？诱之以货财，蛊之以声色，炫之以奇淫之技，痼之以酖毒之媒，虽其地既得矣，仅聚奇衰之男女，数日一礼拜焉。正人君子无一投足者，行且见其地之鞠为茂草，而两书院人材蔚起，蒸蒸日上。³

绛州士绅对教士强索书院一事之耿耿于怀，由此可见。东雍书院归还一事，完全是教会当局求助于法国领事馆，再由领事馆向清政府施加压力才得以实现。地方士绅的反教，是导致日后山西教案的一个重要原因。

2. 文化风俗的冲突。在近代西方武力支持下进入中国乡村社会的天主教带有浓厚的征服性色彩。天津、北京条约签订以后，中国教民取得了信奉天主教的合法保障，对地方所举行的各种迎神赛会及与此有关的活动拒绝参加，对此类活动的费用也拒绝负担，因此与非教民之间的纠纷不断发生。咸丰十一年八月（1861）在山西省传教的法国教士副安当，拟定一项章程，函送山西巡抚英桂，请通行各州县施行。其章程略云：

- 一、 教外之人不许向奉教之人摊派唱戏祭献修庙等钱，因奉教之人钦崇天主，自有修建天主堂礼拜等费，为遵圣教成规。
- 二、 凡奉教之人，以理不出有妨教规等钱。
- 三、 凡有别项不妨教规之公私摊派，奉教人与教外之人按规公出，不可加多，亦不可减少。
- 四、 遇有村社摊派公事，内有杂人异端之事者，奉教之人只出无异端之钱。
- 五、 凡奉教之人不出有妨教规之钱，而教外人索之无法，遂至怀恨不释，或强割田禾，或逞凶严打奉教之人，该地方官必按例惩治。⁴

传教士对与他们信奉的上帝为唯一真理的教义具有根本差异的中国多神信

¹同上，同治二年七月五日总署收法国照会。

²同上，同治二年十一月四日总署收山西巡抚英桂文。

³《教务档山西教务》，《直隶绛州志》，卷十七。

⁴《教务教案档·山西教务》咸丰十一年九月十一日总署收山西巡抚英桂文附副安当拟请通行章程。

仰的社会文化现象持不宽容态度。他们要求在境内“建造修理庙宇暨一切祈雨、谢神、演戏、赛会、干涉仙佛等无益之事，皆永免习教人等摊钱”，¹这种对习教人免除摊派的规定，对吸引民众入教有很大的作用。但是却破坏了农村固有的社会秩序，在信教和不信教人之间造成了严重的抵触。戏乐活动是中国人重要的文化传统，是乡土民众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在平淡无奇的日子里，定期举行的戏乐活动可以把广大农民从枯燥无味的农活中暂时解脱出来，使他们的精神世界得到充实和满足。天主教进入农村社会后，教会以禁止偶像崇拜为由，不准教民参加任何形式的戏乐活动。这样教民就成为生活在乡土之中而又与其生活方式发生严重抵触的特殊群体。此时乡土民众维护传统风俗习惯的要求就同排斥天主教交织在了一起。当时山西地方官向居民分摊各项公款，“而于习教者，因其以求雨、演戏、赛会等事为异端，不愿出钱，故于别项公款，所派比常民多”。²强迫教民多出钱，实际上是强调社会风俗对于所有社会成员的强制作用。双方就此展开的斗争持续不断，愈演愈烈。当天主教试图仅仅因为宗教原因就不遵守村规，拒绝交纳维修庙宇与迎神赛会的费用，在他们自己与村社其他人之间划清界限，从乡村民俗文化的角度讲，教徒的行为已经破坏了村社活动所具有的确保人们心理平衡与社会默契的功用。所以村民势必采取措施，维护社区的制度。1873年孝义县东头村民郭起茂的控词，十分具有代表性：

“缘小的闻听人传说天主教最善，又见有谕单凭据，凡尊奉其教者，庙内之费皆与其无涉。小的奉天主教已十数月之久，向郭士郎等再三说明，凡属村中巡更及各项差徭等费，小的分文不欠，惟演戏供戏庙中等事与小的无涉。彼等违谕忿恨无处所施，合伙定计，不单不肯照看小的庄稼，又且差使他人盗窃小的成熟田禾几半，以致小的明年开春想欲耕种亦无所资，非远游乞食，即雇工度日，田地必将荒芜，皇粮无以起凑，小的托人再三央求，将所取之粮食匿名还回，他事再做商议。彼等并无善言及不容商和之说，硬逼小的上控。第思小的奉教系遵谕而行，并非自私，钱粮差徭并不短欠。谕单有云，习教与不习教皆系中国赤子，自应一体抚之，夫乡舍民人有何不法，彼村社首只可送署究治，何必藐法妄为。”

3

教民的行为在村民看来，已经成为对当地本土文化的严重挑衅，是有意游离于传统社会之外的大逆不道的行为，在群体场合，不从众就会受到谴责，乃至仇视，所以村民便联合起来，共同对付教民，从而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民教冲突事件。

鉴于山西民教交涉事件不断增加，19世纪80年代张之洞任山西巡抚时就设立了教案局，专门处理民教纠纷。张之洞在奏请设立民教局的奏折中称，教徒“恃

¹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明清档案部《照会原件》，法字第45、46号。

²乔志强编：《义和团在山西地区史料》，山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77页。

³《教务教案档》第三辑，第476—477页。

其护符，无理生衅。该教包揽袒庇，，动辄向巡抚衙门投递信函，时来恩扰，教堂日横，民怨日深”。¹ “教民虽曲，而刑罚不加；百姓虽直，而萑楚不免”，终至酿成“民怨愈深，教势愈涨”的局面。² 山西的老百姓在心里埋下了仇恨洋教的种子，一旦时机成熟，就要奋起反抗。

¹张之洞：《张文襄公奏稿》五十卷之卷4，许同莘编辑，民国间。

²刘大鹏：《潜园琐记·州县官欧民入洋教篇》，《义和团在山西地区史料》第33页。

第四章 义和团时期的山西民教冲突

一、山西义和团运动中的民教冲突

义和团原名义和拳，是由义和拳、梅花拳以及大刀会等民间秘密结社组织互相糅合、渗透形成的，是在反对教会的斗争中演化发展起来的。参加义和团的主要是农民、手工业者等社会底层人士。中日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更加肆无忌惮地侵占中国沿海港湾，策划瓜分中国的阴谋。在民族危机不断加深而清朝政府根本无力抵御外患的情况下，以“扶清灭洋”为宗旨的义和团运动在全国轰轰烈烈的发展起来。

山西义和团运动开始于1900年农历5月，最先出现义和团的地方是晋中的榆次。据《榆次县志》载：“庚子夏，拳匪肇衅。当五月下旬，榆次城大乘寺、南关显圣寺有三五贫家子弟……头裹红巾，腰缠红带，累日面向东南焚香念咒，随即仆倒僵卧，醒后如痴如颠……未及旬日，而乡镇迷堕其街之群儿，呼朋结伴，先后争附。并有所为红灯罩。白灯罩诸女童，每晚练习，咸以保国灭教相号召。”¹

¹ 这是地方文献资料中最早出现的关于山西义和团的记载。

义和团运动在山西发展迅速，仅三四个月的时间就蔓延全省，这与巡抚毓贤的作用有关。

毓贤（？—1901年）清末汉军正黄旗人，字佐臣，曾捐过监生，他的父亲在广东做过小官，可能因其家境富有，1887年他捐了山东候补知府，直至1889年才补实缺，被任命为署理曹州知府，两年以后实授。在任曹州知府时，他先是利用当地的大刀会对付盗匪，以后又在大刀会攻击教民时转而对大刀会严厉镇压，杀死了数千名大刀会会员，并处死了其首领刘士瑞。² 他任曹州知府时因澄清吏治、整治河道而获得官声。1895年升为鲁南道台，衙署设在衮州。次年，升为山东按察使，1898年在山东巡抚张汝梅手下任署理布政使，同年秋被调出山东任湖南布政使，1899年3月13日上谕将他调回山东，接替张汝梅职务。

虽然当山东和江苏砀山的大刀会攻击教会时毓贤加以镇压，但他并非是出于保教。相反，而是出于对地方治安的维护。一般学者都认为毓贤是清廷中保守人士的代表，是支持义和团的关键人物。³ 毓贤任山东巡抚期间，对德国在山东地区的扩张一直持抵制态度，他认为，如果德国可以对教民的损失要求赔偿的话，清朝也有权对山东日照、兰山、高密以及德人横行的其他地方对中国百姓造成的

¹（民国）《榆次县志》卷14《旧闻考史事》。

²陈旭麓：《中国近代史词典》上海出版社，1982年版，第733页。又见路遥：《义和团初期斗争阶段的几个问题》《中国近代史论文集》（下）第683—684页。

³徐中约：《晚清的对外关系，1866—1905年》，载于《剑桥中国晚清史》（下），（美）费正清、刘广京编，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室译，1985年2月第1版，第144页。

伤亡要求赔偿。清廷应对德国反其道而行之。¹ 所以当他就任山东巡抚以后，德国公使立即向总理衙门提出照会要求撤换。当时清廷对义和团的态度游移不定、朝令夕改，毓贤也奉行过捕杀义和团的命令，他的做法与他早年捕杀大刀会领袖的做法如出一辙，1899年11月，他诱捕了朱红灯、本明和尚等人。² 但西方列强国家对毓贤是排外主义者的看法没有改变。权威性的近代中外关系史学家英国人马士(H·B·Morse)综合当时的西方在华报纸以及领事馆报告以后，对毓贤作出如此描绘：

“他是个满洲人，在治国的观念上不及普通的汉人官吏，他在一开头便接受了这样的思想：制止洋人最好的方法就是使他处境不安，这也是董福祥和许多地位更高的人们的思想。接连地经过夏季与秋季，上海的新闻记者，一般都是美国传教士，他们指出，那是巡抚毓贤，只有他一个人，使恢复治安成为不可能；就是他支持士绅们仇恨洋人的态度，是他阻止了地方官吏保护受害者的热诚，是他禁止军队采取行动，是他用某些技巧释放了义和团的头目。中国人的意见也支持这种信念。在一封从济南府的一个中国人发给他在上海做官的兄弟的信中确凿地说明毓贤教唆了义和团；他实际上对义和团和大刀会曾经说过——“去杀抢，并且消灭一切洋人和教徒，虽然结社是朝廷明令禁止的，我愿赦免你们的这种罪。”这位中国人写了许多义和团抢掠的例子以后，写道，毓贤曾经对他的官吏说过——“把所有的传教士和他们的教徒们的请愿书都视作废纸；”信中又加了一句——“倘若他要攻击洋人，为什么不打发义和团到胶州去对付德国人呢？”³

在列强的强烈要求之下，总理衙门于1899年12月解除毓贤山东巡抚的职务。12月6日的谕旨将他召回北京，派袁世凯代理他的职位。

当时朝廷中的顽固势力已有开始利用义和团达到排外的目的意愿。他们第一个步骤即是要废除具有改革思想的光绪皇帝。1900年1月24日西太后强迫处于软禁中的光绪皇帝下诏，将多罗端郡王载漪之子溥儁，承袭为穆宗（光绪）毅皇帝之子，时年溥儁十四岁，由崇绮（同治帝的岳父）为太傅，激烈排外的徐本同为少傅，但列强对此并不承认。⁴ 1月16日，也就是“建储”以前的一个星期，西太后召见了毓贤，并赏给他“福”字匾额。此举很明显的是对他的鼓励，也是对外渐趋强硬的宣示。正如我国著名历史学家郭廷以指出的那样：“毓贤至宗，极力揄扬义和团忠勇可恃，得有神助，慈禧召见时赏以亲书“福”字，旋授山西

¹ 毓贤致总理衙门，光绪二十五年五月十五日（1899年6月22日），光绪二十五年六月十日（1899年7月17日）光绪二十五年六月九日奏稿（1899年7月16日），《筹笔偶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7—8页，17—18页，21—22页，《教务教案档》第6辑，第1册，第403—407页

² 《美》柯文（Paul A·Cohen）：《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神话的义和团》，杜继东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8—29页。

³ 马士所引用的原件是美国使馆致总理衙门函，1899年11月11日、16日、25日、26日、27日、12月2日、3日、5日，“美国外交关系”，1900年，第7、8及以后各页。见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三）上海书店出版社影印，2000年，第192页。

⁴ 郭廷以编著：《近代中国史日志》（下）中华书局，1987年，第1062页。

巡抚。¹ 同年三月，清廷将毓贤调任山西巡抚以后，列强一致认为山西的义和团将在他的怂恿之下得以蔓延。马士指出：毓贤是明显地由于美国公使的抗议而去山东巡抚之职的，那位公使对西太后加毓贤以恩宠曾经提出过抗议，而现在他被任命为山西巡抚了。英国和德国公使都提出抗议，美国公使认为这个举动是‘不友好’的，并且警告中国的大臣们说：他的任命将引起麻烦。这个警告获得美国国务院的批准。”²

美国历史学家柯文（Paul A. Cohen）也认为山西形势的紧张与激化与毓贤有关，他指出：“山西省的情况与长江流域各省及山东省的情况截然相反，因为坚决排外的毓贤于3月担任了山西巡抚之职。”³

7月9日毓贤在太原府屠杀传教士是山西“庚子事变”中的重要事件。它标志着山西义和团运动进入高潮，根据多种拉丁文资料综述而成的《山西天主教概述》（初稿）对这件事情是这样记述的：

“1900年4月，巡抚毓贤来到太原府，他下车伊始，立即断绝了同教会的一切往来，拒绝接收主教们的礼品，富格辣主教礼貌地去拜访他，他不接待。同时他从山东叫来义和拳师傅，跳动百姓，摧毁山西的教会，原计划在7月份杀掉山西所有的欧洲人及基督徒。但他又担心教徒抵抗，估计主教府里藏有武器，所以他骗主教及其他的人集中到安全地区，说那里比较好保护。主教们没有反抗他的命令。7月4日夜，主教和自己的司铎和修女们去了上述所谓安全地区。此前毓贤已向西太后申请过杀死所有欧洲人及基督徒的权柄，因八国联军已经进攻北京，他得到答复是否定的。同时太后命巡抚派兵保护她。毓贤为发泄对洋人的仇恨，决意开杀，他估计事后会得到表扬。于是7月9日下午4点，所有的人质都被带到他的衙门前的广场，跪在他的面前。他大声向兵丁宣布：‘一齐都杀’。顷刻之间，杀气腾腾，死者中有两位主教艾士杰和富格辣；两位神父雷体仁和德奥理，一位助理修士安振德、七位修女，五位修道生，九位座堂的勤杂人员（中国教徒），此外同时被杀的还有40位新教牧师和妻子儿女。之后所有的教会建筑及房舍都被火焚烧，巡抚衙门在大街上向人们宣布：如果要受保护，必须退教。7月14日，又杀了42名教徒，应巡抚母亲的恳求，妇女得以幸免。当时全省三个月中被杀教徒4000余人，其中还有7名中国籍神父，200名贞女，300名方济各会第三会的教徒。”⁴

“西辕门灭洋事件”在马士的《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也对当时的情况进行了记述：

那些命令其次九达到山西太原府。在六月二十七日，一群拳民攻击并毁坏

¹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21页。

²马士所引用的原件是1900年3月16日斐纳乐信函；1900年3月23日康格致海约翰信，5月15日海约翰致康格信，见马士《中华帝国中外关系史》（三）第200页。

³（美）柯文：《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第40—41页。

⁴铅印本：《山西天主教概述》（初稿），卷一，第72—73页。

了一个教会医院；在那里住着的人逃跑了，只有一个英国妇人因受伤被推回到烧着的屋子里烧死了。在以后一天里，传教士们不断地吁请当局给予保护，在七月三日有三个官吏“由巡抚派来”，他们督促所有的基督教和天主教徒集中在一个指定的中国式房子里；在七月六日他们照办了，并且有许多仆人伴随前去。在东面八十英里的寿阳的传教士们在企图逃向东边海岸未成之后，于七月八日被带到太原府而关在牢狱里。在七月九日，所有的这些人都会被带到巡抚衙门；在衙门的大门之外，男人、女人、小孩都像普通的犯人一样被剥去上衣等候着。最后，毓贤出来将他们验明，便下令立即斩首。在那时那地，当着巡抚的面就把男人、女人和小孩都处死；首先处死的是太原府的基督教徒，其次是天主教徒，再次是来自寿阳的基督教徒。一个年老白须的天主教主教质问巡抚为什么要作这个罪恶的行动；所得到的答复是，那位巡抚抽出他的腰刀砍在那个主教脸上，鲜血流到他的须间，他很快就被屠杀；那些修士和修女也很快地继他而死。这样，就在巡抚毓贤的眼前，并且由他的命令，有三十四位英国和苏格兰的基督教及十二位天主教徒死去——其中有十五个男子、二十个妇女和十一个小孩。¹

在西辕门灭洋教士的当天夜间，太原大北门的天主教教堂也被焚毁，7月11日毓贤又贴出布告让信教的人出教，不愿意者都受到了重惩。7月14日，毓贤派巡捕率兵会同省城义和团，包围太原头道巷、二道巷的李、樊两院，杀死天主教中国教徒李泽华等39人。8月6日，太原县义和团焚烧杨家堡教堂，杀死天主教徒78人。²与此同时，从省城到太原府管辖的10县以及平阳府、汾州府、大同府、口外几厅，都出现了大量焚烧教堂、杀戮外籍传教士和中国教徒的事情，一个月之间杀传教信教者达千人以上。毓贤上奏清廷，称山西境内洋人已诛尽杀绝。至此山西义和团运动进入高潮。

山西义和团的活动可分为五个区域：以太原府为中心，包括榆次、清源、徐沟、太谷、祁县、寿阳等晋中各县，这是全省义和团的活动中心；以汾州府为中心，包括汾阳、孝义、平遥、介休、临县等地的中西部地区；以潞安府为中心，包括长治、长子、襄垣、潞城、阳城等地的晋东南地区；以平阳府为中心，包括临汾、翼城、曲沃、绛州等地的晋南地区；以大同府为中心，包括大同、怀仁、浑源、灵丘等地的晋北地区；以口外七厅包括归化城厅、绥远城厅、萨拉齐厅、托克托厅、和林格儿厅、清水河厅为主的蒙汉杂居地区。³

以太原为中心的晋中和晋西北部地区教堂大部分被毁，教士教徒多被杀戮，太原地区杀主教2人，中外神甫9人，助理修士1人，修道生5人，白衣修女7人，教徒3000余人，收太原总堂、修道院、保赤会及教会房产400余间，全部焚烧拆毁；太谷县城义和团焚烧了南街耶稣教堂，杀戮教徒，而且伤及外人，知

¹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256—257页。

² 中国史学会编：《义和团》第一册，上海神州国光出版社1951年3月版，第517页。

³ 江地主编：《近代的山西》，山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10月版，第355—366页。

县胡德修设立防务局，举荐曹润堂为团总，招募了团练二百多人，名义上作为保卫。第二年春天解散。¹介休县城义和团人数众多，同知朱焜和一些乡绅都支持义和团，教堂被焚毁。²临县知县孔繁昌迫于毓贤灭洋命令，允许乡间练习义和拳，但始终没有杀害教徒。³雁北、大同地区被杀 130 余人；阳高、天镇两县死教徒 20 余人。

晋南地区的古县因时逢歉年，民不聊生，毁教堂，杀洋人，声势较大。义和团冲入马家节教堂杀死教徒王福花，荷籍林神甫藏匿幸免，又在燕河等地追捕教徒，桥北一女教徒被铡死示众。各处教堂房屋、用具皆被捣毁，教徒纷纷逃往他乡，人数顿减。隰县在城北千家庄杀死教徒两人，在解家洼杀死教徒 10 余人；⁴岳阳县城及北乡一带，义和团设立神庙，杀戮教徒数人；⁵曲沃县义和团数百名焚毁教堂，杀戮教民。后来首领孙某等二人被杀，团民遂自动解散。⁶翼城樊店的马老三为当地义和团的首领，常聚众数百到曲沃、绛州、绛县等处，焚毁教堂，劫杀传教士和男女教徒。翼城东面的史村、浮图、人望、中卫、上卫、吴寨、庙下等十一村组织团练抵御，擒拿团民十七人，送到县衙，县令任畹滋将十七人管押，并秘密派遣官兵诱拿义和团首领马老三和侯姓二人，一同斩首。⁷在襄汾黄崖、汾城等地也有焚毁教堂、杀伤教徒的事情。

晋东南阳城地区沁源县练习义和拳的人并不多，而且当地传教的人都已逃走，所以没有出现大的冲突，仅仅是驱逐了一些乞丐；⁸襄垣县虽然地理位置较为偏僻，但义和团的活动很多，焚杀教徒五人，烧毁房舍数处。⁹石句村的崔成和与郎山村的郎成辰组织头台、石句等八九个村庄的农民参加义和团，习拳练棒，进行烧教堂、杀教徒的行动。在义和团运动中，晋东南地区被杀教徒 1600 余人。

运城地区义和团以陶唐村最为激烈，后被知县姚楷率兵扑灭；¹⁰万泉县各村的年轻人都练习义和拳，地方官不敢过问，县令鲍东设法压制，稍稍平息；¹¹新绛县义和团焚毁教堂，后被刺史李寿芝请平阳派兵镇压。¹²

二、毓贤与地方士绅在民教冲突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¹《太谷县志》1931年铅印本，卷4，《兵防》，第4页。

²《介休县志》1930年铅印本，卷12，《兵防》，第4页。

³《临县志》1917年铅印本，卷12，《兵防》，第5页。

⁴《临汾县志》1933年铅印本，卷5，《艺文类》上，第109页。

⁵《岳阳县志》1913年石印本，卷14，《祥异》，第9—10页。

⁶《新修曲沃县志》1928年修，卷10，《兵防略》，第5页。

⁷《翼城县志》1929年铅印本，卷20，《军政》，第8—9页。

⁸《沁源县志》1933年铅印本，卷6，《大事考》，第8页。

⁹《襄垣县志》1928年铅印本，卷8，《旧闻考》，第8页。

¹⁰《临晋县志》1923年铅印本，卷5，《军政略》，第27页。

¹¹《万泉县志》1917年铅印本，《祥异》，（不分页）

¹²《新绛县志》1929年铅印本，卷10，《旧闻考》，第18页。

山西义和团的活动遍布全省城乡，其活动规模除山东、直隶两省外，全国其他省区都无法比拟。剿杀山西义和团的主要人物岑春植在他的奏折中，提及山西义和团在全境 11 州、40 余县、6 厅进行过活动，事实上山西义和团的活动远比此多，究其原因，我们可以从毓贤本人和当地士绅的态度加以分析：

1. 巡抚毓贤的仇教态度所起的关键作用

首先，毓贤作为一个科举出身的清朝官吏，接受的是封建正统教育，对他来说只有孔孟的遗教是圣教，而洋人的宗教则是异端邪说，中国最底层的老百姓都懂得孝顺父母，尊顺君师，洋教却尊奉一个共有的父亲：“天主上帝”，君臣父子，长幼尊卑，夫妇人伦的纲纪荡然无存，这显然与毓贤头脑中一贯的伦理道德大相径庭，毓贤对洋教表现的仇视与愤恨，包含着更多的文化意识和使命感，它体现的不仅是本土的政治权威对外来宗教权威的不宽容，而且反映了儒家文化的“名教”对另一种文化的“天主之教”的不宽容。毓贤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 年）三月出任山西巡抚后，就立即表明支持义和团的态度，并告示全省：“本部院来晋，首以代伸民冤为务，每逢三八期放告，凡尔百姓，如有冤伸者，可径至本部院投告，呈词不必拘泥体格，虽毛纸亦可书奉。”¹ 副主教富格辣曾拜见毓贤，询问山西“拳匪”之事，毓贤态度轻慢，措词含混。义和团兴起后，毓贤隆重接见从榆次来省城的义和团首领大师兄姜晋华，“大师兄出入府署，无敢阻之者”。于是在一月之间，山西境内杀洋人、烧教堂的事情不断发生。毓贤接见属下时，经常提到杀洋灭教，下属中附和的人得到了重用，反之则受到排斥，于是山西境内官员，一时没人再敢议论义和团的是非。同时毓贤在全省贴出告示，向全省各级官员传达了借义和团灭洋教的旨意：

“为出示晓谕事：照得义和团会，本所以上卫朝廷，下保身家。前者直隶天津地方，洋人猖獗，该义民等助同官军，前往御敌，杀死洋兵无算，朝廷持内努赏费，犹如近日省城，颇有民人传习拳勇，藉此可以化弱为强，原所不禁。惟现已举办保甲团练，以保卫商民，一切街市地面，总以肃靖，而拳民等习练技勇，务须各择僻静所，安分演习，不得于府衙大道、弄棍舞棒。且本部院稔知义和团民，极为安分，不贪财，不妄杀，平日游行街市，从不滋事端。只知奋发忠勇，努力王室，是以称为义民。其有假托拳会，遇事生风，甚或殴辱平民，肆行抢掠，乱杀无辜，即系土匪恶棍，绝非拳民所为，尔等民人等，准其扭送有司衙门，照例分别逞办，决不宽贷。为此示知军民人等，一体知悉，各宜稟遵，切切特示。”²

其次，毓贤从仇恨洋教到作出大规模屠杀教徒的举动是和当时中央的对外政策相一致的。看 1900 年农历六月初三毓贤的奏折，似乎是想对当时的民教冲

¹ 《毓贤之死》，《山西文史资料》第二辑，第 16 页。

² 《山西省庚子年教难前后纪事》，载于《义和团》（一），蔚伯赞、杨济安等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专刊，中国史学会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1982 年 5 月版，第 506 页

突置身事外，奏折中提到山西境内有义和团焚毁教堂的事情，教徒想要加以报复，“虽未足深信，然不得不严加防范。仍以镇静处之。刻下民情尚未骚动，稍可上纾宸廑。”可见，毓贤对当时的情况，并不想插手干预，这和当时中央的态度是一致的。¹稍后，毓贤便接到了中央军机处六月五日的指示，令毓贤对教徒聚众对义和团施以报复的行为予以制止，“现闻直隶县黑风口教堂集众教民甚众，意图滋事。著毓贤速带所募两营，星夜前往，纠合义和团民，相机剿办，勿稍延缓。”²六月十三日，毓贤便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辕门灭洋事件”。从这里可以看出，正是当时中央对洋教的态度发生了变化，毓贤则是紧随这一指示，才作出大规模灭洋的举动。八国联军攻陷天津后，毓贤自请进京勤王。慈禧谕令毓贤统军进京，毓贤临行前告示义和团民：“教民罪大，焚杀由汝为之。勿任地方官阻止也。”七月下旬毓贤离开山西时，八国联军已攻陷北京，两宫太后携皇帝仓惶出逃，途中遇到毓贤，毓贤随驾行至太原，慈禧太后对毓贤说：“今山西无洋人，汝之力也。但各国联军索汝甚急，朕将汝革职，以掩外人耳目。”太后让毓贤陪同，前往杀害洋人的地方查看，并详细询问西辕门灭洋始末。但后来在八国联军的压力下，慈禧太后对洋教的态度逐渐发生了变化。八月二十二日（9月15日），毓贤奏请陛见，要求面陈实情，遭到太后拒绝。此时的毓贤已经敏感的觉察到了中央对外态度的改变，于是又上了另外一道折子，试探中央的态度：

“嗣以拳民人数既众，良莠不齐，遂有游民土棍，以及教民混入其中，结对成群，乘机滋事，扰害平民。复又钦奉上谕：查明教冒拳民，即照土匪章程逗办，……叠据禀报土匪冒拳民滋事，当经本部院查明均予立正典型，不少宽宥。……而本部院仍复谕令教民出教，准照平民一律保护，不啻三令五申，其坚不出教者，亦仅戮其首恶，余仍再四开导，令其出教，不忍概予骈诛。洋人之勾留不去，潜谋倡乱者，始予正法。”³

该奏折中，毓贤自称一方面对义和团加以惩罚，另一方面又对信教之人予以遏制，这说明毓贤拿不准中央的态度，上此奏折，仅仅是想试探中央的态度。所以毓贤的死，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中央在处理对外关系动摇不定的一个牺牲品。

另外中外语言差异、文化差异，也是诱发中外民教冲突的一个原因。在《拳

¹ 《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辑部编，1978年版，页205—206，原文如下：山西巡抚奴才毓贤跪奏，为晋省焚毁教堂，民情尚未骚动缘由，恭折具陈，仰祈圣鉴事：窃山西省中，近日喧嘩，有拳民欲焚教堂之说。六月初一成时，省城内东夹巷英国教堂一所，忽然火起，黑烟冲天，一夜之间，尽成灰烬。幸附近居邻，均属无恙。当火起时，该堂内放枪轰毙民人四名，受伤一名。洋人亦有焚毙者。查验堂内，挖有地窖深而且宽，盖洋人藏污纳垢之处也。并查获逃出幼女五口，发县传其家属领回。现闻省中及四乡教民均赴山岵，聚众甚多，有欲群来报复之谣，虽未足信深信，然不得不严加防范。仍以震惊处之。刻下民情尚未骚动，稍可上纾宸廑。

² 《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1978，页215，原文如下：军机大臣字寄山西巡抚，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初五日奉谕：毓贤奏，拳民焚毁教堂大概情形一折。晋省焚毁教堂，四乡教民有群起报复之语。著李廷肃随时严防，加意保护办理。现闻直隶县黑风口教堂集众教民甚众，意图滋事。著毓贤速带所募两营，星夜前往，纠合义和团民，相机剿办，勿稍延缓，将此由六百里谕令知之。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³ 《山西省庚子年教难前后纪事》1951，第499页。

祸记》里有这样的记载：

“十二日，艾主教遣书洞儿沟安司铎，大旨谓本主教或死或出境，委安司铎代理全境教务，未几，王司铎上书于主教，主教谕雷司铎代覆数言，此函教与郭如意带去，郭惧拳匪邪术，身畔揣圣水一瓶，行经柴市巷，为拳匪搜出，立即送县，洋函则呈毓贤，毓令电报局司事翻译，函系拉丁文，司事不能悟，糊言函中皆相约调洋兵之语，毓闻之忿甚。”¹

由于语言不通造成的误译加深了毓贤对洋教的愤恨和误解，再加上当时对天主教的好多猜疑和误传，使得毓贤对洋教更加反感，“于教堂内搜出妇女二百一十一口，年老者数人，而五六岁十余岁至二三十岁者多。似此藏垢纳污，陷害良民，洵堪痛恨，”“该洋人复主使置毒于井，合城之人益加惶虑，乃该洋人又复与教民等潜相勾结，希冀扰乱省城，以图一逞。”² 毓贤对天主教的这些误会，主要来源于根深蒂固的文化误解和民族误解，天主教教堂终年关闭，过于神秘，自然会引起好多的猜疑和误会，而正是这种猜疑和误会加深了毓贤对天主教的厌恶和反感，促使他断然作出“奴才于六月十三日，……将洋人大小男女四十四名口，及同恶相济之教民十七名，一齐擒获，立即绑赴市曹，同时正法，以彰国典，而靖人心”的举动。³

2. 地方士绅对教会持敌视态度：

地方士绅的态度，对天主教是否受到冲击，关系很深。当时的地方士绅大致分为两种态度，一种与毓贤一致，对天主教极为反感，极力主张灭洋，以下这一奏折具有代表性：

鸦片之毒，祸国殃民，但只不过是耗人钱财，损人身体，灭人志气，还没有控制人心。然而自从异端邪教兴起，象白莲、大理、上帝等教，包藏祸心，毒害远远大于鸦片。洋教士混于民间，对当地人妖言惑之，并以小恩小惠加以笼络，使不少人开始信奉天主教，为了防微杜渐，特发告谕劝民依然尊奉孔孟之道，不要听信妖言，误入歧途。”⁴

¹ (清)李问渔：《拳祸记》，(上下卷)，上海土山湾印书馆，1923年，25开，页337—338。

² 山西省庚子年教难前后纪事，第501页，原文如下：奏为洋人勾结教民，潜谋倡乱，业已正法，恭折仰祈圣鉴事。窃晋省传教洋人，闻津沽开衅即有煽惑聚众，蠢动情事。嗣于六月初一日，东关巷教堂，为义和团民焚毁，奸谋日亟，潜聚教民益多，民心惶惶，日夜惊扰。奴才恐其一旦乱行，滋蔓难图。遂设法令中军参将首府县，将省中洋人，诱令迁居一处。当于教堂内搜出妇女二百一十一口，年老者数人，而五六岁十余岁至二三十岁者多。似此藏垢纳污，陷害良民，洵堪痛恨。该洋人复主使置毒于井，合城之人益加惶虑，乃该洋人又复与教民等潜相勾结，希冀扰乱省城，以图一逞。奴才于六月十三日，不动声色，带领兵勇，前赴洋人聚居之处，亲自兜拿。该洋人等尤敢并刀抗拒，奴才麾令勇敢数人，冒死突进，将洋人大小男女四十四名口，及同恶相济之教民十七名，一齐擒获，立即绑赴市曹，同时正法，以彰国典，而靖人心。据寿阳县秦锡圭拿获滋事之洋人七名口，押解前来，一并将其立正典刑。是晚北门教堂，亦为拳民焚烧，省城洋人教堂已无遗迹，然省城洋人教堂虽无，城外洋人教民尤众，奴才仍督饬各属，随时相机办理，以免患生不测。所有洋人勾结教民，潜谋倡乱，业已拿获正法缘由，谨恭折由驿驰陈，伏祈皇太后皇上圣鉴。谨奏。

³ 同上。

⁴ 《教务档》，第四辑，页13。原文如下：临汾县署正堂潘示，光绪六年正月十九日（1880年2月28日），“为钦奉圣谕，劝民以崇正学事：照得鸦片来自外洋，鸩毒中国。昔人比其祸甚于洪水猛兽，然犹不过削

另一种态度则比较开明，能出力保护教会，但着眼点也仅在于免祸或者安民，如办理解州教案的张制军在义和团运动中购买军火，防止义和团民进城，禁止解州老百姓练习义和拳，并保护教堂教民，他在奏折中清楚的说明了这样做的目的：“卑职署理山西解州十阅月矣，夙夜兢兢，时虞陨越，职分当为之事，无敢怠忽。惟本年拳教相仇，关系天下治乱。拳匪入晋，尤关全省祸福。卑职智短才疏，当兹时事，深恐覆束，貽患无穷。所幸千虑一得，略有把握，不致办理乖方，上廑宪虑。”¹

总之，从当地官绅的态度来看，大部分倾向于反教，即使有一些个别的官吏，也仅仅是为了避祸或者安民，才采取一些比较温和的政策，而且在当时的形势下，这样的官吏也是遭到排斥的，在《拳祸记》中有这样的记载：“毓接见属员，屡言杀洋灭教之事，属员中有是之者，有非之者，是者升官，非者黜革，于是官场趋势，附和同声。”²

人之肤，颓人之志，耗人之财，而未陷人之心。自异端之说起，如白莲、大理、上帝等教，包藏祸心，敢行称乱，此固前车之可鉴者，而其害有更甚于鸦片者矣！夫嘉庆道光之时，疆宇艾安，民物滋丰，犹不免此。况当大祲之余，保无前项匪徒豺狼成性，鬼域居心，改立名目，潜迹其间，诱以甜言，施以小惠，小民易感难晓，见异思迁，致有堕其术中，实为世道人心之虑。本县下车伊始，杜渐防微，亟宜晓示。为此，谕阖邑士民人等知悉：尔等务宜学宗孔孟，勿惑他歧。庶不致无父无君，辱及高曾，祸殆子孙。至于非圣人之道而自为一端，从之者果有利无害，本县忝膺民牧，而必劝使勿为，不特阻人为善，直是有意殃民，定干天厌。惟本署县生长南邦，见闻早确，幸勿视为恒泛。故特竭诚晓谕城乡明理绅耆，务将本县黜邪崇正至意，各就各村，广为开导。能言拒杨墨者，圣人之徒也。本署县实有厚望焉。切切。特谕。”

¹何见扬撰《省心堂杂著》，上卷为公牍，下卷为杂文，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铅印本。此文选自上卷。

²《拳祸记》第333页。

第五章 义和团时期的山西教会

一、义和团运动中死伤的主要传教士

根据多种拉丁文资料综述而成的《山西天主教概述》(初稿)记述了山西义和团运动中天主教徒的死伤情况:“在三个月之内,杀死教徒4000有余,其中有七位中国神父,二百贞女,三百方济各三百方济各会教徒及其它信教群众不分性别、年龄、条件,由守备武官李富到大街上的乞丐,由劳人至儿童甚至吃奶的婴儿;怀孕的妇女;四个教徒村庄,两百余处教堂或祈祷所被火烧毁。”下面简单介绍一下义和团运动中死伤的一些主要人物:

艾士杰(详见本文第二章)。

富格辣(详见本文第二章)。

雷体仁,是洞儿沟方济各会院创始人之一。1839年7月2日生于意大利,1858年加入方济各,1868年4月与8位同伴来中国分担富格辣等人的工作,刚开始他在太原府传教,以后的二十年在大修道院任院长,同时教授神学,死于1900年7月9日。¹

德奥理(S·Teorico Balat,OFM),总务神父,1854年10月23日生于法国,1880年加入方济各会,1885年12月1日到达山西太原府。德奥理中文很好,令中国人都惊讶。德奥理在山西洞儿沟新的方济修院落成后被派作初学导师,后在太原府作理家兼管帐,并兼任中国修女的神学老师。死于1900年7月9日。²

安振德(S·Andrea Bauer OFM),助理修士,1866年11月24日生于法国,在英国时加入方济各会,1899年5月4日随同富格拉、八位司铎、七位修女、四位修生等到达中国,在太原做了十四个月的传教工作,在太原的修院里服务,也在诊所里工作,死于1900年7月9日。³

范怀德(S·Antonino Fantosati,OFM),1842年10月16日出生于意大利,二十三岁加入方济会,并成为神父,1867年12月15日与雷体仁一起到达中国,范怀德在中国共传教三十三年,他汉语学得很好,对中国文化颇有研究,曾建过一所孤儿院,1892年范怀德被晋升位湖南东部郊区的代理。1900年7月7日,范怀德到达山西太原府,当天与当地的其他传教士同时被杀。⁴

厄尔明纳(S·Erminia di Gesu,FMM),修女院院长,1876年4月28日生于法国,1896年9月8日加入玛利亚方济各传教修女会。1899年7月4日与其余6位修女跟随富格辣到达山西太原传教,除担任院长外,她还在太原成立了一家

¹李毓华,《中华殉道圣人传》,第244页。

²同上,第246页。

³同上,第252页。

⁴韩承良:《忠烈英魂一方济会中华殉道圣人小传》,第136-143页。

诊疗所，死于1900年7月9日。¹

那连理(S·Maria di Santa Natalia,FMM)，1864年5月5日生于法国，1888年加入玛利亚方济各传教修女会，死于1900年7月9日。²

菊斯德(S·Maria di San Giusto,FMM)，1866年4月26日生于法国，1890年10月23日加入玛利亚方济各传教修女会。死于1900年7月9日。³

雅都斐(S·Maria Adolf,ina Diericks,FMM)，1866年生于荷兰，她很小的时候就成了孤儿，1892年3月19日加入玛利亚方济各传教修女会，死于1900年7月9日。⁴

嘉纳(S·Maria Chiara Nannetti,FMM)，1872年生于意大利，1892年4月10日加入玛利亚方济各传教修女会，死于1900年7月9日。⁵

雅曼定(S·Maria Amandina del S·Cuore,FMM)，1872年12月28日生于比利时，1885年7月16日加入玛利亚方济各传教修女会，在太原成立的诊所里做事，死于1900年7月9日。⁶

巴溪(S·Maria della Pace di Bolsena,FMM)，1875年12月13日生于意大利，1893年6月6日加入玛利亚方济各传教修女会，巴溪还是一位优秀的音乐家，1900年7月9日被杀。她是玛利亚方济各传教修女会首批被杀的人中最年轻的一位，不满二十五岁。⁷

以上七位修女是玛利亚方济各传教女修会的最早成员，因她们身着白衣，太原地区称“白衣修女会”，她们是1899年5月4日随富格辣来的。

张景光·若望，四品修士，山西太谷富井村人，1879年生，十二岁入小修院，1894年进入山西太原大修院读书，1897年升四品；死于1900年7月9日。⁸

董博第·巴得利爵，剪发修生，山西太原古城营人，生于1882年，1893年入院，1897年剪发，曾去意国都灵，死于1900年7月9日⁹

王瑞·若望，修士，山西文水新立村人，1885年2月26日生，1895年入修院，曾去意国都灵参加万国博览会；死于1900年7月9日。¹⁰

张焕·若望，修士，山西阳曲县西郊南社人，1882年2月18日生，13岁进入洞儿沟小修院读书，14岁进入太原大修院，死于1900年7月9日。¹¹

¹同上，第72—80页。

²韩承良：《忠烈英魂—方济会中华殉道圣人小传》，第103—106页。

³同上，第90—92页。

⁴同上，第93—96页。

⁵同上，第85—89页。

⁶李毓华，《中华殉道圣人传》，第276页。

⁷同上，第278页。

⁸同上，第254页。

⁹同上，第260页。

¹⁰李毓华，《中华殉道圣人传》，第263页。

¹¹韩承良：《忠烈英魂—方济会中华殉道圣人小传》，第117—119页。

张志和·斐理伯，修士，临县善庆峪村人，生于1880年，1896年入院（由孙占元送）。¹

赵毓谦，由杜约祝圣为神父，传教于洪，赵多年，1890年当家，1897年任秘书；

张若瑟，1838年生，1867年由江类思祝圣为神父，忻州传教七年，后至五台，朔州；

申保禄，1840年生，1859年入修院，1872年晋铎，初传教于忻州，阳曲北乡，六年后到太原县汾东传教；

杨雅各，1860年生，1877年入修院，晋铎后于忻州，朔州传教十余年；

孔宪文，1864年生，1892年晋铎后，赴晋西永宁州宁乡一带传教八年死于马宗沟；

史载笔，1872年生，1885年由本堂王玛竇送入修道院，晋铎后，在永宁、临县传教；

王合勋，1899年12月3日由富格辣祝圣为神父，八个月后被杀；

申计和·多默，艾士杰的助手，壶关县安口人，1851年生，1857年随本堂张保禄去洞儿沟；

陈西满，富格辣的助手，潞城县安阳村人，与富主教同去都灵，同回太原；

武安邦·伯铎，食堂管理，雷体仁的助手，西柳林人，是个有学问的人；

张荣·方济，棋子山人，保赤会的看门人；

阎国栋·雅各伯，总堂的厨师，西涧河人，是阎纳定河阎福两人的本家；

冯德·玛弟亚，总堂下夜的是朔州小坝石村的新教徒，由张若瑟付洗；

王二满·伯铎，修道院厨工，古城营人；

张板牛·伯铎，阳曲县士岑村人，总堂杂工，是张若瑟及张安道两人的本家；

赵全信·雅各，西柳林人，住东二道巷，曾去猪头巷铁路局看望艾士杰等人；

2

二、教会自身的因素

山西教会在义和团运动中死伤人数如此之多，当时在全国来说也是比较罕见的，从教会本身的原因来讲，有以下几点：

首先，教会对形势的估计不准确，甚至抱有幻想。在《拳祸记》中记载了这样的事，当毓贤全城戒严，不许教徒出入时，主教对中国神父说：“尔华人不至于死，某处藏金若干，某处有契据二箱，事平后尽数收之。”主教确信当时毓贤的打击对象仅仅是外国传教士，明显的低估了事态的严重性。《拳祸记》中还有

¹李毓华，《中华殉道圣人传》，第257页。

²铅印本：《山西天主教概述》（初稿），卷二，第6—7页。

这样的记载，道台恩铭来到教堂，安慰主教，并假装责骂义和团，主教便以为他是真心保护教会，将堂中的传教士人数据实告知，外面知情人却说，恩铭这次来是奉了毓贤的命令，前来探听虚实。¹ 主教对恩铭等官员深信不疑，这反映了教会对当时的形势估计不足。

其次，教会的一些主要领导人一心求死，放弃抵抗。在《拳祸记》中记述了当时大难临头，教会的主要领导人对武装抵抗的看法：“六月初一午时，富主教由洞儿沟回，会议拒匪之计，有人倡议，购枪抵敌，富主教大为不然，谓天主堂非营寨之比，不可守以刀枪，倘天主欲吾致命，亦属甘心，倘尔等必欲设防，余惟有他往而已。众人闻言，辄罢抵匪之议。”² 教会不设防，肯定是束手待毙，但组织民防是否有效，则可以从以下两个武装抵抗的例子中取得答案：《拳祸记》中记述了徐沟清源乡梁泉道成功武装抵御的事例：

徐沟清源乡梁泉道地方，有教友六百余。六月初，风声甚恶，……既而各出避难，嗣以遍地皆匪，不能行走，决计重回本宅，尽夜守堂，整备拒敌。七月十三日十四两日，徐邑黑城村教友，被拳匪土痞围困血战，十五夜八下种，梁泉道教友，选壮丁三十余名。各持军器械驰往救之，援出男女老幼二十余。……十七日午刻，……群匪分三股来攻，教友亦分三股击之。获胜，午后四下钟，拳匪土棍，奋勇前来，教友放枪拒之，毙匪一名。拳匪又退，教友抢获大炮五尊，二十一日十下钟，教友生擒一匪，杀之。嗣又得大炮一尊，由是教友之胆，日益壮。”³

虽然山西义和团对教会的杀戮得到毓贤的支持，以区区教堂的力量是难以抵御的，但组织民防抵抗，还是能够起到好多作用，至少可以减少死伤人数，一些小村内人的生命和财产能够得以保存。

最后，教徒的致命心理。山西死伤人数如此之多，天主教徒本身甘愿致命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在山西现在仅存的一些义和团时期所立的碑刻里可以清楚的看出当时的天主教徒的态度，在杨家堡致命碑志里写道“然我杨家堡致命诸公，既奉真教，信心坚确，明识造物真主，理当崇之事之，以图报造生存养之恩于万一，故不能因一时之患，背弃天地。”⁴ 光绪三十一年八月中秋节有一位叫高长

¹ 《拳祸记》，原文如下：白和将六门所拘雷司铎修院生供役人等，仍送回堂，夜十一下钟，道台恩铭来堂。谓主教曰：“贵主教今日吃了惊。”主教曰：“也算不小。”恩曰：“此等愚民，无知妄作，甚属可恶。”既而问堂中尚有几个洋人，主教素与恩铭交善，意其真心保护，故实告之：“堂中现有洋人五个，其余不知何往矣。”恩曰：“主教勿惧。有兄弟保护。”主教曰：“即有大人保护，何惧之有。恩命兵士二十人，在堂门外彻夜巡查。不准闲人近立。并不许行人停聚一处。兵曰唯唯。视此举动，似出实意，然外人言，恩铭此来，奉毓抚密委，查看洋逃未。

² 《拳祸记》页 334

³ 《拳祸记》第 358 页

⁴ 山西省庚子年教难前后纪事，第 516 页，原文如下：夫我圣教，创自乾元，垂自太始。凡霜露所坠，日月所照，国不分文，蛮人无论智愚，闻正道而望余光者，人争向善，俗增淳美，故得流行日广，信徒益众也。虽恶官污吏，时或迷于邪说，崇信异端，将吾。天主教不查道理真假，惟以珍灭为怀，荼毒滔害，无所不至，传道之士，遭显戮于巨渊，信教之人，虽风波于无因，然正教之光，不因此而稍晦，反因之而益明，否则处常易处变难也，果能固坚，心旌不为风波所摇，见义思为，锐志不因困厄而挫，难到临头，宁愿舍

安立了一块碑，上面也写了当时天主教徒的致命心理：“当思好生恶死，人之常情，杀身成仁之本德。是以处常而能保身，理固当然，处变若肯授命，贤者方可，奈俗人不知大道，弗明道理，偶见患难临头，辄图苟免，不问仁义何在，只顾求生，随其好生恶死之情，昧于杀身成仁之德，……是故真教之人，虽至身首异处，而正教之道，终不容背也。”¹

山西是一个封建文化底蕴非常深厚的地方，乡土意识极为浓厚，封建的孝道和宗族观念深入每个山西人的心中，首先家庭的影响作用、家长家族的信仰态度在个人行为选择中具有重大的引导作用。义和团运动兴起后，在出教意味着保全性命，否则就会被杀的危急时刻，有人劝绛州高方娃之子背教，方娃说道：“如背，不是我子，高娃中不能容忍背教人也。我生尔于世，岂不能生尔于天堂，何为背教？”方娃之子本来就是小孩，无心背教，听了父亲的话后，致命之心更为坚决；²潞城高家庄一名教外人见一名王姓神父要遭杀身之祸，于心不忍，偷偷给了他一千文钱，说：“你可背教出逃。”神父说：“吾祖上七八世奉教，我背么，宁死不从。”³其次对天主教教义中所描绘的“天堂”的向往和眷恋是一批虔诚善良的教民为主积极致命的根本动力。繁峙高某在被义和团问到“为什么入教”时，回答说：“因为它好。”⁴简单的一个“好”字是教民对于“天堂”世界的整体描述，美好的彼岸究竟是什么样子？绛州李某的妻子和女儿都已死去，唯有小女儿未死，告诉她的父亲说：“予见我母我姊致命后，衣白衣，光丽异常。”⁵太原城中，众人诵完苦路经后，有一个小孩说：“我念时，心神恍惚，见我爹身着

生取义，不敢背道偷生，吾知非真教之人，固有所不能也，谚云：家贫显孝子，国乱显忠臣，教难即辨真伪，不益确而有证乎？省垣八里有杨家堡，民教共处，尚称辑睦，迨至光绪庚子，毓抚愁教害洋，波及教民，地方官推波助澜，严令改教，惩治拳匪，专使与教为难，各处无赖十棍，操此为发洋财之券，于是，千百成群，猖獗当道，首府之人，不独为设法平弥，反更倡首于前，东招西聚，用备器械，官令逼于外，付欲诱于内，一时放火杀人，抢掠劫夺，是皆以害教为快事，杀人为英雄，逼教民无藏身之处，其惨暴如此，见者心怵，而闻者胆寒，当斯时，吾天主教，又谁愿为教民而不思卷耶，然我杨家堡致命诸公，既奉真教，信心坚确，明识造物真主，理当崇之事之，以图报造生存养之恩于万一，故不能因一时之患，背弃天地。大主，免暂时之难而遭永殃之祸也，六月初，闻拳匪大难所临，众皆视死如归，不求苟免，惟共聚一堂，十三，问主教司铎等被害，毫不畏惧风处静以待，十八日，城内教民被杀者四十余，闻之益加勇毅，自早至晚，惟望授命报主，以正真道，到七月十二日，拳匪恶棍，蜂拥而至，围杀焚烧，共烧男妇老幼七十八名，约皆视死如归，怡然致命，殁后，拳徒集尸兴火，焚具遗骸，几至减绩，夫善勇哉诸公，当患不思逃避，自愿为主致命，全忠孝与永恒，享天堂与无穷，诚千载之人也今者，期以三周，谨收焚骨数片，敬而敛之，用以昭珍重致命遗体，并将遭难殉身诸公姓名，附勒于后。

¹山西省庚子年教难前后纪事，第513页，原文如下：省垣庚子致命诸公墓碑：当思好生恶死，人之常情，杀身成仁之本德。是以处常而能保身，理固当然，处变若肯授命，贤者方可，奈俗人不知大道，弗明道理，偶见患难临头，辄图苟免，不问仁义何在，只顾求生，随其好生恶死之情，昧于杀身成仁之德，与此而欲求见义心为，见危授命者，于此辈概无望已，然询诸正教之人，则异是，惟其异是，乃益证三军可夺志之语，显相同也。是故真教之人，虽至身首异处，而正教之道，终不容背也。不观乎庚子我教之难乎，当其风波初起，大难始兴，宪谕屡颁，逼令出教，故友苦劝，强其面从，希图侥幸一时，以保财命，倘属贪生怕死群，鲜不乐从，何至血流成河，尸积如山，视财物如浮云，等性命于鸿毛，岂好生恶死，非教民之常情哉。而不知教民亦人也，何至弗惧死耶？特以死贵得其道耳。苟得其道，则死甚甘。其知者，以为道不可背，不知者肆言在数难逃，此不通之论也，何则？

²《拳祸记》，第411页。

³同上，第368页。

⁴（英）爱德华兹：《义和团运动时期的山西传教士》，李喜所、郭亚平等译，南开大学出版社1986年3月版，第104页。

⁵李问渔：《拳祸记》，第401页。

白衣，光辉都丽，呼我名曰‘黑柱，不要怕，当为天主致命’。”¹ 这样的描述吸引教徒急于见主，迅速摆脱人间苦难，享受天国优厚待遇。在太原城中，义和团到达教徒聚集处，教徒见后，都喜出望外，认为到了升天堂的日子，男女都跪倒在地，等待致命。不料一人高呼：“止刀，不许再杀。”教徒未致命者，都大失所望，相向而哭，认为自己错失了进入天堂的绝好机会。²

山西天主教徒基于以上种种原因，确信自己“所信奉者乃天道”，³因此“宁可守道，死不愿弃道”。⁴于是出现了象古城营这样全村一起致命的情况。光绪三十四年古城营为在义和团中死伤的教徒立了四块石碑，⁵一块序言，一块六姓致命五十一口，⁶一块董姓致命三十九口，⁷一块闫姓致命四十二口，砌于教堂墙面，现存三块石碑，闫姓一块，迄今尚未找到。

¹同上，第342页。

²同上，第411页。

³同上，第165页。

⁴同上，第214页。

⁵文革前，李建堂（当时尚未晋牧）曾让闫巧娥、闫粉花、闫仙花等三人，夜间抄录了碑文，但因用油笔抄录，文革后已成一塌糊涂。文革中石碑果被拆毁，老会长闫仪被管制劳动，修水道，暗暗将石碑盖在水道上，将此事密告孙儿闫增喜。改革开放后，闫增喜带领四名青年教徒，从地下两米深处挖掘出来，但闫姓致命一块，迄今尚未找到。

⁶董姓石碑的内容是：董姓致命人数统计三十九口列后：董义德，圣方济各，年五十七岁，妻任氏圣名玛利亚，年四十九岁。长子圣名安多尼，年二十七岁。儿妻王氏，圣名罗撒，年二十二岁。三子圣名安德肋，年一十八岁。四子圣名辣法厄尔，年一十一岁，二女圣名玛大利纳，年八岁，孙圣名若望，年四岁。共被害八口；董义福，年五十四岁，妻段氏，年三十八岁。长子乳名毛亲，年二十一岁，次子圣名安德肋，年一十八岁，三子乳名三小，年一十一岁，四子乳名四儿，年五岁。长女乳名肉妮，年二十五岁。保赤女年七岁。全家被害；董鸿喜，圣名保禄，年四十五岁，妻王氏，圣名加辣，次子圣名安德肋，年一十六岁，三子圣名若望，年一十岁，四子年六岁。全家被害；董晋泉，圣名类思，年六十一岁，妻李氏，圣名玛利亚，子乳名柱只，妻保赤女，大女乳名林只，儿女乳名猴亲，年一十七岁，全家被害；董晋元，圣名类斯，年四十五岁，妻闫氏，年四十岁，子，圣名安德肋，奶奶二十一岁，保赤女，乳名丑婆，一十四岁，全家被害；董二介，圣名依纳爵，年三十八岁，母，圣名莫尼加，年七十四岁，胞弟圣名雅各伯，年一十岁，全家被害；董楞小，圣名雅各伯，年三十一岁，母氏圣名玛大利纳，年五十四岁，妻武氏，年二十六岁，女圣名玛利亚，年七岁，全家被害；董黑旦，年四十七岁，未奉教，甘心致命。—光绪三十四年九月勒石

⁷六姓致命石碑的内容是：六姓致命人数统计五十一口，列后：张永和，圣名玛弟亚，年四十五岁，子，圣名斐理伯，一十二岁，女圣名亚纳，年一十四岁，全家被害；张跟和，圣名若望，年四十二岁，妻张氏，圣名玛利亚，年三十四岁，长子圣名弥额尔，年一十七岁，次子圣名方济各，年七岁，三子乳名春元，年三岁，四子乳名米元，年一岁。长女圣名玛利亚，年一十四岁，次女圣名加辣，年一十二岁。全家被害；任进礼，妻武氏，长子乳名富恒，年一十三岁，次子乳名天恒，年一十岁，三子乳名贯恒，年七岁，四子乳名回恒，年四岁，次女乳名二亲，年一十五岁，胞弟妻杜氏，侄子乳名恒只，年一十四岁，次侄女乳名计桃，年一十二岁，全家被害；郭永福，年五十岁，妻牛氏，圣名玛尔加利大，年三十八岁，长子乳名富贵，年十九岁，次子乳名荣贵，年一十七岁，四子乳名四儿，年九岁，五子乳名玉贵，年四岁，女乳名金香，年一十一岁。全家被害；李贵，年七十余岁，孙名喜牛，被害；段太英，圣名伯多禄，妻闫氏，圣名玛利亚，胞弟圣名保禄，奶奶四十三岁，长女乳名桃美，保赤女一名，母王氏，全家被害；段门常氏，圣名莫尼加，年七十四岁，儿妻王氏，圣名路济亚，年四十二岁。四孙，圣名若翰，年十岁，五孙，圣名若瑟，年三岁，次孙女，圣名玛利亚，张爱亲，年三十余岁，母韩氏。全家被害；高家宝堡刘门董氏，圣名玛利亚，子乳名臭小，女乳名金娥，共三口，死于此堂；金胜村张德和，圣名安多尼，胞弟德禄，圣名伯多禄，弟妻王氏，圣名玛利亚，侄子乳名跟喜，次侄子乳名六儿。侄女乳名玉兔，共六口，死于此堂。—一通共致命人数一百三十二口。

第六章 善后:帝国主义列强与教会的复仇主义

一、处置官员和停止科举

因八国联军以惩办罪魁为议和的先决条件,一九零零年八月初三日(9月26日)毓贤被清廷解职,由湖南布政使锡良接任山西巡抚。不过,朝廷对毓贤并不准备采用过激措施,在答复洋人质问时,仍以“山西省拳教仇杀,巡抚毓贤办事操切,业经开缺不用”一类的陈词搪塞,洋人对此十分恼火,明确表示必须严惩毓贤等士绅才开始和议,直到九月二十二日(11月13日)朝廷谕内阁称:“此次肇祸诸臣,纵庇拳匪,开衅友邦,贻忧宗社,前经降旨,分别惩处-----已革山西巡抚毓贤,在山西巡抚任内,纵容匪拳,戕害教师教民,任性妄为,情节尤重,著发往极边,充当苦差,永不释回。”因与列强各国已结为“友邦”,毓贤纵容义和团民杀害教士之罪名也宣告成立,并因此而被发配极边,永不释回。冬十月,毓贤被发配新疆。即便如此,列强各国依然不能满意。这一年的十二月二十五日(1901年2月13日)在毓贤行抵甘肃省时,太后降旨:

“已革巡抚毓贤,前在山东巡抚任内,妄信拳匪邪术,至京为旨掇扬,以致诸王大臣受其煽惑。及在山西巡抚任,复戕害教师教民多命,尤属昏谬凶残,罪魁祸首,前已遣发新疆,计行抵甘肃,著传旨即行正法,并派按察使何福堃监视行刑。”

第二年的春节刚过,也就是在光绪二十七年的正月初三日(1901年2月21日),毓贤等行抵皋兰县(时与兰州府治一地),抱病在身,无法前行,适值护理陕甘总督李廷萧接到圣旨,指示将毓贤就地正法。

光绪二十六年闰八月初六日(1900年9月29日),锡良正式就任山西巡抚。秉承清政府求降政策的宗旨,锡良在全省范围内“保护教士,安辑教民,严惩拳匪”,先后借给滞留山西的英、法、意等国传教士白银3.95万两,积极准备办理“教案”。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初二日(1900年12月23日)上谕内阁:

“山西教堂,自锡良到任以后,于该省教士教民,飭属认真保护。数月以来,晋省民教相安,诚恐日久,该地方官复形疏懈,匪徒等或藉端滋事。著锡良再行能飭各属,于有教堂处所,务须格外加意防护,倘有匪徒藉仇教之名,有意寻衅,或兵勇滋扰,即飭严拿务获,从重惩办,并将该地方文武及管带营官严行参办,毋稍宽贷。”¹

庚子年十一月二十九日(1901年1月19日),锡良在冀宁道设立“教案局”,后改称洋务局。光绪二十七年正月二十三日(1901年3月13日),到任山西巡

¹ (清)《德宗实录》,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86年版,卷475,第2页。

抚还不满半年的锡良被朝廷开缺候简，陕西巡抚岑春煊调任山西巡抚。三月初十日，岑春煊走马上任，来山西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熟悉西方事务的沈敦和调到山西洋务局任总办，协助他办理山西教案。沈敦和是浙江鄞县人，曾留学英国，担任过翻译等职事。八国联军侵占张家口后，沈敦和留任张家口洋务局总办，办理教案。沈敦和来到太原后，协助岑春煊修订了李提摩太草拟的《清理山西教案章程》。三月十五日（5月3日），根据岑春煊的请求，清政府调在籍吏部主事劳乃宣、在籍广西候补道魏瀚、直隶候补知府吕增祥等前来山西，共同办理教案。然而山西教案头绪繁多，案情复杂，一个半月以后岑春煊上奏：“晋事重大，病体难支，恳请开缺，回籍调治”，他对在山西办理教案实在没有太大把握，便借口生病，要求离开山西，然而没能得到当朝者的批准，谕旨称“该抚办事尚属认真，年力正富，著即力疾从公，毋庸开缺”。¹三月二十一日（5月9日）岑春煊又提出“山西教案，清理不易，拟请明定赏罚，以示劝惩”。朝廷令其自定章程清理教案。据《德宗实录》这年六月十六日（7月31日）条记载：岑春煊有病在省，奏请开缺，清廷再赏其一月假期，但不得开缺离任。²当全国教案在七月初陆续清理完毕之时，只有山西一省教案迟迟未了，遂谕令军机大臣：“惟山西教案未了，所有善后事宜，均关紧要。该抚办理一切，向能任劳任怨，正赖悉心经化，用副倚任。”³一个月后，山西教案草草议结。

清廷对直接或间接参与义和团运动的山西官吏的处治是教案善后事宜的一个重要部分。各省涉嫌参与或支持义和团的官员，从判处死刑到革职的大约有120人。山西是处理地方官最多且处分最重的一个省。从光绪二十六年闰八月初九日（1900年10月2日）西太后一行从徐沟县启程时令内阁将徐沟县开缺算起，就开始了对山西州县地方官员的处理。除了毓贤，介休县知县陈日稜，是第二位受到处分的县令。慈禧一行逃亡途中，一路疾行一路处分参与支持义和团的地方官员，直到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山西教案全部了之时，山西全省受到直接处分的州县级官员有26人，除毓贤和陈日稜之外，其余的人分别是：汾州知府徐继孺，忻州知府徐桂芬，署归化城同知郭之枢，和林格尔通判毛世黼，署托克托城通判李恕，恕宁远州通判沈荣绶，以上6人定为斩监候罪名，免去死罪，发往边疆充军，永不释回；归绥道郑文已被正法；隰州知州崔澄寰、曲沃知县王廷英、孝义知县姚学康、寿阳知县秦锡圭，均被革职，发往边疆，永不释回；归化城副都统奎成、泽州知府陶家驹、潞城知县璧理、高平知县于岱霖，均被革职，永不录用；临县知县孔繁昌、太原城守营石凤岐、长子知县恩顺、大同镇总兵杨鸿礼、太原知县何宗逊、署宁乡知县郝振霖、署岳阳知县刘黎辉、署榆次知县吕

¹同上，卷482，第13页。

²《德宗实录》，卷475，第2页。

³同上，卷475，第2页。

继纯、太原武官马得胜，均被革职；¹

在处理山西教案过程中，一个对山西读书人极为不利的条款是在光绪二十七年二月二十一日（1901年3月30日）出台，由各国公使提出的暂行停考5年的各省城镇清单，计有山西、直隶、河南、山东、湖南、浙江、江西、陕西、黑龙江、吉林、盛京等11个行省，作为对发生过义和团运动各省的惩罚。经过几个月的商讨，确定全国停考之地方68处，山西一省停考地方就占据了其中的三分之一，而太原府、忻州、太谷县、大同府、汾州府、孝义县、曲沃县、大宁县、河津县、岳阳县、朔平府、文水县、寿阳县、平阳府、长子县、高平县、泽州县、隰县、蒲县、絳州、归化城、绥远厅等22处“均应停止文武考试五年，以为轻信拳匪及闹教滋事者戒”。²而山西1902年和1903年的乡试，则实行“借闈”考试，也就是到其他省参加考试，《潜园琐记》中详细记述了这次借闈考试的办法：

“光绪辛丑，因庚子一役歼戮洋夷，定各省滋事之府厅州县，五年之内不得举行文武各等考试。是以壬寅、癸卯（1902、1903年）两科乡试，直隶山西均系借闈举行。至各省学政校士不得在停考处开闈考试，必须于无事处另作考闈。如山西学政考试太原、榆次、祁县、徐沟、清源、交城等处生童，不得在太原府学院考试，而以徐沟县金河书院作为考闈之类是也。

壬寅科补行庚子、辛丑两科乡试：

山西乡试不得在本省太原府举行，借陕西之闈。秦晋士子同日进场，秦占东文场，晋占西文场。山陕考官亦同日入闈，各取各士，而监临、提调、监试、同考等官皆陕西省者也。

癸卯科会试乡试：

山西仍在秦闈，与壬寅科同。”³

科举制度是中国古代士绅阶级的仕途的必经之路，停止科举是对士绅阶级的极大的惩罚，其主要原因是当时许多教会人士认为教案实际上是士绅阶级发动的。从这一点上也能看出，山西在义和团运动失败后是受害最重的省份，这对近代教育并不发达的山西省是非常不利的。

二、庚子赔款和地方赔款对山西经济造成的严重后果

早在北京陷落之前，慈禧太后就委任李鸿章为全权代表议和大臣，与列强进行谈判。光绪二十七年七月二十五日（1901年9月7日）由奕劻和李鸿章代表满清政府，与11国代表在最后议定书上签字，这一年是农历辛丑年，所以议定书称为《辛丑条约》。

¹ 《德宗实录》卷481，第13—15页。

² 同上，卷481，第13—15页。

³ 《义和团在山西地区的史料》，第72页。

《辛丑条约》的内容是相当苛刻的，它包括正款 12 条和 19 个附件。其中对中国损害最大的是条约的核心条款——巨额赔款。此次赔款的数额巨大是空前绝后的，总数达到 4.5 亿两白银，分 39 年还清，本息合计达 9.8 亿两。此外还有地方赔款 2000 万两以上，总数超过 10 亿两。这项赔款史称“庚子赔款”。

庚子赔款议定，全国除黑龙江、吉林、盛京、乌里雅苏台将军辖区和西藏大臣辖区外，赔款在全国 19 个省区内分摊，每年摊银数百万两之上的省份有 10 个，其中 8 个省是属南方和东南沿海经济比较富裕或对外贸易较发达的地区，内陆两省是河南、山西，而湖南、山东、福建、直隶、山西等省的赔款都在百万两以下。山西除每年支付 116.3 万两的庚子赔款外，还要支付高额地方赔款。

在固关、娘子关战事之后，巡抚岑春煊与山西主教安怀珍(Barnabas Nanetti)开始商谈，安怀珍提出数额惊人的索赔，如赔偿杨家堡教堂 1 万两，圪壕沟教 2 万两，太原大北门教堂 200 万两等等。同时安怀珍还对岑春煊以及办理教案的道台沈敦和不时进行要挟，光绪二十七年三月十七日(1901 年 5 月 5 日)安怀珍在给当时驻太原办理教案的另一外籍传教士刘博第的信中这样讲道：

“我给抚台写信说，如果他们不重修房舍，不注意义和拳头目，你给道台直捷了当地说明白。我马上召回神甫们，一切谈判就中断，向北京请求解释……如果来了军队，那就不能怪我们了，因为他们不执行钦差的规定……你同你的钦差，要站得坚定，为总堂要二百万两银子。”

几天后，安怀珍在另一封信中又说：

“你明白地答复道台和抚台：他们要在何处作损害的赔偿呢？……六百万是在北京定了的，他们将要给六百万。省是穷的，但这是各国钦差说的，不是一国的钦差。他们该自己想办法，并要负起责来。”

安怀珍甚至威胁说，如果不依他们的条件，就将召回神甫，迫使谈判破裂。在他的另两封信中还这样说：

“又要收到另一批银子了，请你千万注意称平，按法库平(Jau-Ku-pin)给的银两过秤？因为按照那个平法，比我们的高得多，以钱调换，可立刻赚到二十两到五十两银子。”

“为晋祠敲打、敲打、再敲打！百姓不说什么，因为他们很知道去年的事。如果端方来作视察，可缓慢些进行。关于五万的事，由北京将来命令，我要一连串的五万，为教会要二百万。”¹

在安怀珍的这些信件中，教会在处理教案善后事宜上的蛮横霸道和复仇主义态度表露无疑。

此时，山西天主教主教安怀珍对山西地方当局施加压力，法国驻汉口公使玛玺理提出由山西支付 500 万两银包办全省教案，然而意大利不同意由法国包揽，

¹张茂先译：《帝国主义扼杀山西义和团的罪证》，《山西文史资料》第 3 辑，第 19 页。

在京的法、意公使对此争吵不休。岑春煊派出道员郑景福赴京与法、意公使谈判，终于签订了《山西教案合同》。根据该合同条款规定，天主教会所属太原府、汾州府、大同府、宁武府、朔平府、忻州、代州、保德州、平定州等5府4州的天主教获得赔款100万两，由法国代管的荷兰所属的南教区、口外6厅教区获得赔款125万两，共计付天主教赔款225万两。然而，法国公使又以口外各厅“被灾”较重、赔款太少不敷分配为由，两次提出增加赔款的要求，后经山西洋务局沈敦和、军机大臣王文韶等与法国公使交涉，又为口外的天主教会争取到65万两银。几项合计，山西付给天主教的赔款达到290万两之多。¹ 山西省从此背上了沉重的经济债务。

巨额赔款使得山西财力的拮据状况更为突出，筹集赔款的途径主要是这样几条：一是增加地丁银，二是增收盐、酒、牲畜、土药税，三是新增煤炭税，四是劝富商捐款，五是捐官由虚衔变为实授，六是按州县摊派。地丁银是常项，过去每年征收白银283万两，现在为了支付赔款，每两银要加收1钱5分，外加火耗银1厘5毫，如此全省每年可增加37万余两。还有盐业加费，仅是潞盐一项，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八月清政府令各省盐区在原有基础上再行加价，每斤加收4文，抵付庚子赔款。潞盐3省加价达到54万两。山西煤炭也开始加税，同时鼓励商人捐官。《潜园琐记》是这样描述捐官的：

“辛丑之和，赔款甚巨，各省府厅州县均设捐局，筹集其款。地方官延请本处绅士入局劝捐，贤者则趋而避之，不肖者则趋而入之。官藉捐款辑绅，绅藉捐款媚官。官绅一心，上下其手，从中渔利。官则捐多报寡，绅则得贿匿情。”²

赔款中数额最多的还是对各府州县的强行摊派。据记载，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全省9府10州1道摊派总数达到168.94万两，其中太原府61.2万两，平阳府13.25万两，蒲州府7.3万两，汾州府28.85万两，潞安府7.6万两，大同府4.5万两，宁武府9000两，泽州府7.5万两，朔平府1.05万两，辽州府8000两，沁州1.3万两，平定府1.95万两，忻州1.84万两，代州3.8万两，保德州6000两，霍州2.4万两，解州5.5万两，绛州7.3万两，隰州3000两，归绥道11万两。³ 在筹集赔款的过程中，山西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如土盐原价每斤20文，加价后涨至40文，一斗小麦由加价前的200文陡涨至1800文。⁴ 从此山西经济更趋萧条，商店歇业，当铺倒闭，民不聊生，人口锐减。庚子赔款和地方教案赔款对山西的发展是巨大的灾难，对近代山西的经济发展打击最大，山西至此一蹶不振。

山西天主教在义和团运动后迅速发展起来，从教徒人数以及教会规模都有了

¹ 《义和团运动在山西》，第63页。

² 刘大鹏：《潜园琐记》

³ 《山西通史》卷六，第286—287页。

⁴ 《义和团运动在山西》，《山西通史》卷六。

明显的发展，以下是义和团后的山西总主教凤朝瑞在任职其间根据每年的报告总结出的山西在 1902 年到 1910 年天主教发展的情况：¹

事 项	1903	1904	1905	1906	1907	1908	1909	1910
外籍教士	13	19	12	16	18	17	20	18
中国神父	10	13	15	15	14	14	13	13
助理修士			4	4	5	3	4	4
白衣修女	6	11	7	10	13	13	16	14
大修生	18	15	14	15	14	18	14	20
小修生	15	14	16	18	31	23	28	22
男学校	30	50	80	85	58	59	90	99
男生	630	920	1500	1510	1120	1030	1527	1670
女学校	25	45	50	57	50	50	70	75
女生	510	715	1200	1160	1000	900	1293	1386
教徒	14658	15412	16492	17357	18200	19185	20126	21145
望教者	2541	3671	5179	7034	7032	8000	8428	10799
会口	261	263	266	269	269	272	280	295
大堂	7	11	20	22	22	23	26	29
小堂	145	150	154	154	154	159	164	167
成人受洗	227	335	343	418	534	696	792	659
儿童领洗	587	878	920	839	1000	932	954	1099
热心工人	19958	28590	33059	31329	39620	36965	40650	40500

从此表可以看出，义和团运动后，山西天主教依靠充足的资金和政治上的优势得到了蓬勃的发展，而这种优势是完全依靠不平等条约和强权政治而获得的。

¹铅印本：《山西天主教概述》（初稿），卷二，第 16 页。

第七章 结 语

近代中国的民教冲突以 19 世纪 60 年代至 90 年代末最为激烈，山西是近代中国民教冲突最为激烈和典型的地方，因此，选择这一地区作为研究对象是有一定意义的。

山西的天主教自明末以来即十分兴盛，晚明来华的耶稣会士在山西活动频繁，高一志、艾儒略等人在当地的开教工作是中国天主教史上的重要一页。由于山西是具有丰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地方，当时来华的耶稣会士亦注重与当地文化的融合，所以地方绅士乐于同他们交往，如韩云、韩霖、段袞等人还成为早期中国著名天主教徒。他们加入教会，组织善会，主办社会慈善事业，绛州还一度成为明末刊行天主教书籍最多的地区之一。

然而，鸦片战争以后的形势为之一变。在不平等条约的庇护之下，山西天主教有了长足的发展，与原先的秦晋教区相脱节。山西成为一个独立的教区。自 19 世纪 60 年自 90 年代，时有民教冲突发生，究其原因，教会利用不平等条约的保护，干预词讼，借助列强外交压力迫使清政府归还“禁教”时期被充公的房产，从而引发当地绅民阶层的反感和不满，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东雍书院的例子，便是一个典型。同时，大量的史料表明，中西之间风俗及文化的差异，也是一个诱发的因素。

义和团时期山西的民教冲突特别激烈。义和团是 19 世纪末年的一次最大规模的民众反洋教斗争，并发展成为民族对外战争。义和团无疑具有正义的立场，它是中国底层民众在帝国主义列强的经济压迫、政治侵略以及教会跋扈的刺激之下自发的反帝爱国民众运动。同时，由于它的参加者都是来自下层社会，其手段及观念带有落后的非理性的因素。正如著名历史学家陈旭麓教授指出的：

“义和团是外族凭临之下不愿为亡国之民者用自己选择的方式直接诉诸行动的结果。多重的历史内容决定了义和团运动的民族正义性，又决定了这种斗争的历史局限性。在这里，深沉的爱国主义情感是同植根于自然经济的保守意识连在一起的；抵御外侮的强烈愿望是同陈旧的天朝观念和华夷之见连在一起的。这种矛盾，显示了一场正义的反帝群众运动中落后的封建主义内容。当旧式小生产者自发地充当民族斗争主体的时候，他们不能不在代表民族的同时又代表传统。矛盾不是主体选择的结果，而是历史规定性的体现。”¹

义和团时期山西民教冲突特别激烈的原因，与巡抚毓贤的鼓励以及官绅阶级的激烈排外的情绪是分不开的。毓贤是当时清朝地方官吏中顽固派的代表人物，他在江苏和山东都发动过排教运动，虽然早期他也镇压了大刀会，捕杀了山东义和团的几个首领，但这是出于维护地方治安的考虑。在窥视到西太后清廷中央准

¹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 年 7 月版，第 194 页。

备全面宣战以后，他一手在山西挑起了激烈的排教运动。义和团的斗争是正义的，但清廷中的顽固派利用义和团去达到他们盲目排外的目的，其结果是将中国引回到乾嘉时代闭关锁国的老套，这与中国近代化的历史主流是背道而驰的。其结果是将国家和民族推向了灾难的境地。

在山西民教冲突中，并非每一个教士教徒都罪该当死。但本文在使用教会文献中，只选择其中符合历史事实的部分，去除了带有“护教”情绪的评论，因为教会文献的叙述是从教会的立场出发的，时有偏颇，且忽略了事件的前因后果。从“善后”这一章中可以看出，教会在 1900 年以后的立场是复仇主义。对列强指名道姓地要求处死山西官员，当时的教会不置一词，而对教会的赔偿，安怀珍主教的立场是以牙还牙、毫不退让。对天主教会的赔款是山西善后事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给山西以后人民生活造成了沉重的负担。而在教案频发地区停止科举考试是对官绅阶级的严厉惩罚。在这些问题上，山西教会采取的复仇主义态度至为明显，在 20 世纪最初十年山西天主教人数的大大的增加正是在强权保护之下传教的结果。

参考文献

专著

1. 朱谦之：《中国景教》，东方出版社，1993年版。
2. 邓恩：《从利玛窦到汤若望 1552—1773》，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
3. 费顿之著，梅乘骥译，《明清间在华耶稣会士列传 1552—1773》，上海天主教光启出版社，1997年版。
4. 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中华书局出版社，1988年版。
5. 韩承良：《忠烈英魂一方济会中华殉道圣人小传》，香港天主教方济会出版，2000年10月版。
6. 顾卫民：《中国与罗马教廷的关系史略》，东方出版社，2000年版。
7. 吕实强：《中国官绅反教的原因（1860—1874）》，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1986年版。
8. 方豪：《中西交通史》（二卷），岳麓书社，1987年版。
9. 方豪：《方豪六十自定稿》（上下二卷），台北学生书局，1969年版。
10. 方豪：《方豪六十自定稿补编》，台北学生书局，1969年版。
11. 陈旭麓：《中国近代史词典》，上海出版社，1982年版。
12.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三），上海书店出版社影印，2000年版。
13. 郭廷以：《近代中国史日志》（下），中华书局出版社，1987年版。
14. 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15. 江地主：《近代的山西》，山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10月版。
16. 爱德华兹：《义和团运动时期的山西传教士》，李喜所、郭亚平等译，南开大学出版社，1986年3月版。
17. 柴莲馥：《庚子教会华人流血史》，文海出版社，1935年印行。
18. 费赖之著，梅乘骏译：《明清间在华耶稣会士列传（1552-1773）》，天主教上海教区光启社，1997年11月版。
19. 陶成章：《教会源流考》，广州中山大学历史语言研究所，1928版。
20. 朱其华：《中国近代社会史剖析》，上海新新出版社，1933版。
21. 陈增辉：《清末教案第五册》，北京中华书局，2000版。
22. 林仁川、徐晓望：《明末清初中西文化冲突》，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版。
23. 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24. 陈振江、程啸：《义和团文献辑注与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25. 林华国：《义和团史事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26. 相蓝欣：《义和团战争的起源》，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27. 周锡瑞:《义和团运动的起源》,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重印)。
28. 周锡瑞著,张俊义、王栋译,《义和团运动的起源》,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
29. 蔡尚思等:《论清末民初的中国社会》,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版。
30. 柯文(Paul A·Cohen):《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神话的义和团》,杜继东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31. Allen, Charles Wilfrid: Jesuits at the Court of Peking. Shanghai, no date.
32. Cohen, Paul A: China and Christianity, the Missionary Movement and the Growth of Chinese Antiforeignism, 1860-1870.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3.
33. Lattourette, Kenneth Scott: 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s in China, New York 1929.
34. Lattourette, Kenneth Scott: A History of the Expansion of Christianity, 7 vol, New York.
35. Wolfershan, Bertram: The Catholic in China from 1860-1907. London, 1909.
36. Ray R. Noll: 100 Roman Documents Concerning the Chinese Rites Controversy (1645-1941), San Francisco University Press. 1992.

论文:

1. 鲁利:《路易·樊守义和澳门》,澳门《文化杂志》第二十一期,1994年第4季度。
2. 郭崇禧:《太原天主教史略》,载于《太原文史资料》,太原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辑出版。
3. 阎宗临:《〈身见录〉校注》,载于《阎宗临史学文集》,山西古籍出版社,1998版。
4. 路遥:《义和团初期斗争阶段的几个问题》,载于《中国近代史论文集》(下),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编,中华书局出版社,1979年7月版。
5. 徐中约:《晚清的对外关系,1866-1905年》,载于《剑桥中国晚清史》(下),(美)费正清、刘广京编,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室译,1985年2月第1版。
6. 赵树好:《晚清教案发展阶段新探》,载《义和团运动一百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上卷,山东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7. 行龙、赵英霞:《从迎神赛社看近代山西民教冲突》,载《义和团运动一百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上卷,山东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8. 成晓军、范铁权:《中西文化冲突与直隶义和团运动的兴起》,载《义和团运动一百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上卷,山东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9. 李宏生:《毓贤与山东义和团》,载《义和团运动史讨论论文集》,齐鲁书社,1982年版。

10. 林瑞琪：《义和团事件中太原市致命这特多的背景原因》，载自《义和团运动与中国基督宗教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湾辅仁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11. 黄一农：《明末韩霖〈铎书〉关名前序小考》，载于澳门《文化杂志》2000年春、夏季。
12. 黄一农：《天主教徒韩霖投降李自成考辩》，载于《大陆杂志》第九十三卷第三期，1996年9月。
13. 黄一农：《明清天主教在山西绛州的发展及其反弹》，载于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6期，1996年12月。
14. 《齐大季刊》3卷5期，1934年12月。
15. 《毓贤之死》，《山西文史资料》第二辑。
16. 中国义和团研究会，《义和团运动与近代中国社会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齐鲁书社，1992年版。
17. 中国科学院山东分院历史研究所编：《义和团运动六十周年论文集》，中华书局，1961年12月版。

史料：

1. （明）宋濂等编著：《元史》，卷九，至元十三年六月。
2. （清）康熙《绛州志》，北京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抄本，原刊于康熙九年，卷一。
3. （清）张廷玉等编：《明史》，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本，2003年版。
4.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明清档案部《照会原件》，法字第45、46号。
5. （清）刘大鹏：《潜园琐记·榆次义和拳篇》，载《义和团在山西地区史料》，乔志强编著，山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6. （清）张之洞：《张文襄公奏稿》五十卷之卷4，许同莘编辑，民国间。
7. （清）刘大鹏：《潜园琐记·州县官欧民入洋教篇》，《义和团在山西地区史料》。
8. （清）何见扬撰：《省心堂杂著》，上卷为公牍，下卷为杂文，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铅印本。
9. （清）《德宗实录》，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86年版，卷475、482、481。
10. （清）李问渔：《拳祸记》，（上下卷），上海土山湾印书馆，1923年，25开。
11. （清）佚名：《筹笔偶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
12. （清）李希圣：《庚子国变记》，载《义和团》第一册，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
13. （清）柴萼：《庚辛纪事》，载《义和团》第一册，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一册。

14. (清)艾声:《拳匪纪略》,载《义和团》第一册,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一册。
15. (清)唐晏:《庚子西行记事》,载《义和团》第一册,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三册。
16. (清)祝蒂:《庚子教案函牍》,载《义和团》第一册,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四册。
17. 《榆次县志》(民国),卷14《旧闻考史事》。
18. 《太谷县志》,1931年铅印本,卷4,《兵防》。
19. 《介休县志》,1930年铅印本,卷12,《兵防》。
20. 《临县志》,1917年铅印本,卷12,《兵防》。
21. 《临汾县志》,1933年铅印本,卷5,《艺文类》上。
22. 《岳阳县志》,1913年石印本,卷14,《详异》。
23. 《新修曲沃县志》,1928年修,卷10,《兵防略》。
24. 《翼城县志》,1929年铅印本,卷20,《军政》。
25. 《沁源县志》,1933年铅印本,卷6,《大事考》。
26. 《襄垣县志》,1928年铅印本,卷8,《旧闻考》。
27. 《临晋县志》,1923年铅印本,卷5,《军政略》。
28. 《万泉县志》,1917年铅印本,《祥异》。
29. 《新绛县志》,1929年铅印本,卷10,《旧闻考》。
30. 刘泽民等主编:《山西通史》,山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31. 乔志强编:《义和团在山西地区史料》,山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32. 张茂先译:《帝国主义扼杀山西义和团的罪证》,《山西文史资料》第3辑。
33. 翦伯赞、杨济安等编:《山西省庚子年教难前后纪事》,载于《义和团》(一),中国近代史资料专刊,中国史学会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1982年5月版。
34. 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编:《教务教案档》第一辑,1974年版,第三辑,1975年版;第四辑,1976年版,第五辑,1977年版。
35. 天主教台湾地区主教团、宣圣委员会编印:《中华殉道圣人传》,2000年3月版。
36. 中国史学会编:《义和团》第一册,上海神州国光出版社,1951年3月版。
37.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辑部编:《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1978年版。
38. 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义和团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59年版。
39.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辑部:《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中华书局,1990年版。
40.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清末教案》,中华书局,1996年版。
41. 山东师范大学近代史研究室:《山东教案史料》,齐鲁书社,1980年版。

发表论文

《明清时期天主教在山西的传入及发展》，载《湖北大学学报》，湖北大学学报编辑出版，2003年5月增刊。

致 谢

毕业论文终于写完了，此刻在写最后的致谢词时，心里充满了深深的感动与依恋！

首先感谢我的导师顾卫民教授，他学识渊博，平易近人。三年来，无论是在理论学习阶段，还是在论文的选题、资料查询、开题、研究和撰写的每一个环节，顾老师都给予了我悉心的指导和帮助。顾老师对我言传身教，不仅传授了我好多知识，更重要的是教会了我许多做人的道理，这都将使我终身受用。

其次要感谢山西太原教区副主教李建华神父，我在本论文收集资料过程中得到了李神父的热心帮助，他不但给我提供拉若干珍贵的第一手资料，而且对我的论文提出了好多宝贵的意见，同时也要感谢太原解放路天主教堂图书馆的孙斌慧，他曾数次帮助我查找、复印资料。他们无私的帮助，我永远铭刻在心。

其次要感谢李向平、陶飞亚、郭长刚、张童心、夏正伟等老师，三年之中，各位老师给了我好多的教诲和帮助，这都将成为我一生的财富。

感谢贺斌、鲁娜老师，他们在生活上学业上都给予了我们无微不至的关怀，为我们顺利完成学业付出了相当的辛苦。

感谢孟蓉、寻红霞、郑红萍、钊圣妮、徐文华、姜浩然、刘义、李旭、王礼密等同学，三年的同窗，他们无私的帮助和深厚的友谊使我莫齿难忘。

最后特别感谢我的家人，是他们的理解和支持使我走到了今天。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我愿在未来的学习和工作过程中，以更加丰厚的成果来答谢曾经关心、帮助和支持过我的所有老师、同学和朋友。

王美荣

2005年5月6日